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维德的故事

西柏坡的灯光

第十四册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难忘的故事

屡试不爽的围城打援

1948 年 2 月，根据中央决策，彭德怀决定发起宜川战役。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围宜川，敌军必援。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一向对我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英雄劲儿。加上第 2 纵队仍在河东，敌人可能估计 2 纵队不会马上过来，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22 日，第 3、6 纵队开始向宜川攻击前进。23 日肃清了宜川外围的敌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暗秘密开进，于 24 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包围了宜川城。第 1、4 纵队则隐蔽集结在洛宜公路两侧。

这时，黄龙山区朔风呼啸，寒气袭人。由于人烟稀少，部队只能靠山露营，筹集的原粮无法加工，只能吃玉米粒和山药蛋。但是，指战员们情绪高昂，阵地上响彻“消灭整编 29 军，活捉刘戡”的口号声。

宜川被围后，彭总即电告 3 纵司令员许光达和 6 纵司令员罗元发，要求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担任主攻的 3 纵独立 2 旅和 6 纵教导旅，在张开基、陈海涵两旅长指挥下，先后占领了宜川外围要点老虎山、虎头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人压缩在城内。

守敌整编第 24 旅旅长张汉初惊慌失措，赶忙向胡宗南急电求援。

胡宗南也在算计：会不会是共军玩的围城打援的老把戏，国军可是吃过不少这方面的亏，都是共军一围点，国军必出援，半路又必被共军大部队伏击。他认真算着西北共军的情况。算来算去，他认为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是游击队编成，现在以 3 个纵队攻宜川，1 个纵队在河东，必定无力打援。此时，胡宗南得意地笑了：

“人说毛泽东料事如神，彭德怀谋划最精，这次也失算喽！”

于是乎，胡宗南命令刘戡驰援宜川。

2 月 26 日，刘戡率部出发，沿着洛宜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宜川开来。敌援军走我军预计的第一条路线来了。彭德怀即令各纵队按预定的第一方案的部署行动，只第 3、第 6 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守敌，其他 9 个旅的兵力，立即在瓦子街以东的南北高地进入阵地。第 2 纵队（23 日于禹门口强渡黄河）按野战军司令部要求迅速向圪台街集结。彭总还让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随带警卫部队去迎接 2 纵，向 2 纵王震司令员传达战役方案。

我军根据彭总之策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刘戡这个老狐狸还是上当了，他还认为我军阻援的部队不过 1 个纵队，不超过 8000 人，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仍令其 61 旅继续向铁笼湾攻击前进。

28 日晚，敌援军后续部队已经通过瓦子街，进入瓦子街沟底的公路，敌军拥挤在沟里，队形混乱，刘戡决定调整部署就地宿营，并占领附近高地，将 61 旅撤回到任家湾以南高地，构成环形防御。刘戡打算 29 日突到宜川，因而仍摆着进攻的架势。当夜大雪下个不停，冻土难掘，敌援军没法构筑工事，这就对我军歼灭援敌造成了很为有利的形势。

我第 1 纵队隐蔽地紧紧尾随敌援军开进，在查明敌援军后续部队已全部通过瓦子街之后，攻进瓦子街，继绝了敌军退路。

刘戡根据侦察报告，发觉前进的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被切断，已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命令迅速集结突围。

在我军的合围下，敌刘戡部经连日战斗，伤亡惨重，整编 31 旅旅长周由

之、整编第 47 旅旅长李达、整编 53 旅副旅长李秀岭相继被击毙，其他中下级军官死伤不计其数，敌军士气颓丧到极点。

29 日夜，大雪如卷席，纷纷整一夜。敌人瑟缩避寒，我军冒雪筑工事准备翌日的总攻。

3 月 1 日上午 9 时许，彭总、张宗逊等人率野战军司令部由上绛头推进到圪背岭，即发出总攻击的命令。

刹那间，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1 纵由西向东，2 纵由南向北，4 纵由北向南，6 纵（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3 纵独 5 旅由东北向西南，四面八方对敌展开围歼战。

这时，我军截获刘戡致胡宗南的电报，他绝望地发出“ 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哀鸣，作困兽斗。

战至下午 5 时许，敌 29 军全军覆没，严明被击毙，刘戡用手榴弹自杀身死。

随后 3 纵 2 旅又智取了宜川内七郎山，宜川战役胜利结束。

宜川战役，共歼敌整编第 29 军军部、整编第 27 师师部、整编第 90 师师部、整编第 24 旅、第 47 旅、第 53 旅、第 61 旅、第 31 旅共 3 万余人，缴获甚多。

这一仗，极大地震撼了蒋家王朝。蒋介石匆忙从南京赶到西安，安抚军心，并将华东、中原兵力增援西北，以确保西安和关中。这就给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得以联合发起洛阳战役的战机，有力地策应了中原战场的作战。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改变了，西北野战军直指关中。

雪后天晴，朝霞初上，流金溢彩。彭德怀站在宜川城头，巡视战场，想到毛泽东关于此役的英明决策，想到此役之重要意义，不禁大发感慨：

“ 论打仗，谁也不如毛泽东。宜川一战，牵动全局。打在西北，功在中原，我老彭指挥这一仗，能使中原三支大军得以活起来，也不枉这副总司令的头衔啊！ ”

毛泽东离开陕甘宁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确定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于 18 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共中央前委，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继续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同时，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经晋西北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临行前，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

一天，刘少奇问聂荣臻：“ 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 ”

聂荣臻回答：“ 白毛女传说出生在平山，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 ”

朱总司令仔细地从地图上看了平山的地理位置后说：“ 要选一个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 ”。

5 月，朱总司令派人从平山县沿滹沱河逐村进行勘察后，一致看中了西柏坡。

不久，刘少奇、朱德等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

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撤离延安

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 317 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 12 个县境内的 38 个村庄，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

到了 1948 年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行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 3 月 21 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临行前的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情况的通报》，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国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等。也通报了中央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了 13 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征途。

毛泽东离开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 23 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

当地政府早已秘密地在渡口准备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稳健地登上第一条船。马上，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

倾刻间，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船慢慢地远了，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向东岸驶去。

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毛泽东渡过滔滔黄河，便踏上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

毛泽东上岸后，回头眺望着黄河，久久不肯离去。他转身对周恩来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稍微停顿一下，他深情地说：“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显然，他的心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

踏上黄河东岸，毛泽东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期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

毛泽东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他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3 月 26 日，毛泽东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 月 1 日和 2 日，他又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

在蔡家崖停留 8 天后，毛泽东又上路了。他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之后，他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 4 月 13 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他在城南庄共住了 35 天。

在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7 日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这是自撤离延安后 5 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已有 1 年有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 3 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6 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在 5 月 18 日的早晨，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庄。正在吃早饭的聂荣臻急忙走到院子里，循着越来越大的轰鸣声望去，发现一架敌机已经飞来，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不多时，又飞来两架敌机。聂荣臻仔细一望，看清是 B25 轰炸机，于是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通宵都在工作，当聂荣臻走到屋内的时候，发现毛泽东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聂荣臻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聂荣臻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 不能再延迟了 ”。聂荣臻当机立断，让警卫员去取担架。

片刻，警卫员取来担架。聂荣臻向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递了个眼色，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毛泽东刚走进防空洞，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敌人飞机投下的炸弹，在他所住的小院及附近爆炸。

这次敌机共投下 5 枚炸弹，其中 1 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爆炸，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

看到这些，聂荣臻直觉得后怕。

显然，敌人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 20 多公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 9 天后，于 5 月 27 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依山傍水，正处于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而且只有七八十户人家，隐蔽性较好。毛泽东环视着这个小山村，高兴地对刘少奇说：“ 你们选择的这个西柏坡，真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5 位书记齐集西柏坡，大家有一股说不出的愉悦。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在这里，他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组织召开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直到 1949 年 3 月 25 日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机关迁入北平（今北京）。

徐向前发兵攻“卧牛”

临汾位于山西省南部，汾河下游、同蒲铁路路线上，一向为汾河下游物质集散中心。它是晋南重镇和战略要点。相传尧帝曾在此建都。历代封建王朝都在此地设立郡府。临汾古城，内高外低，东高西低，西靠汾河，东有东关为屏障。城墙内外砌以石头，里面装填泥土，高达 14 余米，厚达 20 余米，城墙上能并行两辆卡车。远远望去，临汾城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素有“卧牛城”之称。城墙外围，环绕着一条 10 米宽的护城壕。

传说当年李闯王站在城北兴隆殿上，向城里观察，被敌人射瞎了一只眼睛，气得他直跺脚，把盔甲挂在一个小村庄的大树上，拍马而去。从那时起，这个村庄就取名叫“挂甲庄”，这个故事，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没有考证过，但临汾城易守难攻，则是真实的。

当时防守临汾的是阎锡山的第 6 集团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梁字太璞，河南光山县人，保定军校第 3 期毕业，历充阎的旅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是王靖国系的顽固骨干分子，又是阎锡山的“铁军组织”的 28 名骨干之一。驻临汾的国民党军兵力，计有：阎军 66 师 3 个团（师长徐其昌），胡宗南部第 30 旅两个团（代旅长谢其昌），兵力共约 1.2 万人，附有补充团 2 个，约 3000 人。另外地方保安团队共 11 个团，兵力约 1.5 万人。连同各师旅直属小部队，守临汾的总兵力约 3 万人左右。

临汾城，对于敌人，是一重要战略支点；对于我军，解放临汾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徐向前指出：解放临汾的战役，不仅影响本军本地还将有力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我军作战，并且打下临汾后晋南就完全没有敌人的残留据点了，可使我晋冀鲁豫区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胡敌军，解放华北扫清障碍。

徐向前胸怀全局，知难而进，主动报请中央军委，要求组织临汾攻坚战役。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批准他的建议，并令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临汾前线指挥所，由徐向前任临汾前线指挥所司令员，具体组织实施临汾战役。

徐司令员于 2 月中旬即来临汾前线，亲自作政治动员，整训部队，并作出战役部署：以原集结在赵城、洪洞一带同蒲路两侧的部队，担负防敌北窜、相机打援的任务；以吕梁军区部队一部位于汾河以西，牵制城西守敌；以 8 纵队位于城南，13 纵队位于城东，太岳军区部队位于城北，以向心合围态势，首先扫清敌人外围警戒阵地，拔除护城据点，攻克东关，尔后进攻主城。在战术上采取 3 面围攻的打法，力争将敌主力消灭于外围阵地。他指出：在城外歼敌越多，敌人消耗越重，即可减少攻城的阻力。并决定于 3 月 10 日，开始战役行动。

3 月 5 日，我前指破译出胡宗南给临汾守敌第 30 旅旅长尹瀛洲的紧急电报，中央军委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紧急电报，得知胡宗南为挽救其在西北战场的失败，顾不得临汾垂危，急于空运其第 30 旅到西安。徐司令员为策应西北战场作战，牵制守敌，果断地命令我第 8 纵队在 3 月 7 日凌晨前奇袭尧庙机场，粉碎胡宗南空运 30 旅至西北战场的“蝉蜕”计划。于是战役比原计划提前 3 天发起。

当时 8 纵部队正在行军途中，不便联系，为争取时间，徐司令员派作战参谋，乘他的专用吉普车给 8 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送来命令。王新亭接到命令以后，立即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提前到达预定位置，以突然行动先

行占领敌飞机场。命令 24 旅 72 团，迅速接近机场，以迫击炮袭击飞机场，敌人有 10 架运输机正在装运部队，当即被我击中两架运输机。由于部队没有经验，不会封锁飞机跑道，让 7、8 架敌飞机逃掉了。待命装运的敌军亦仓皇逃往城内。我军控制了飞机场，使胡宗南的空运计划遭到破产。敌 30 旅只运走 4 个连的兵力，其余仍留在临汾。我军其他方向上的部队乘 8 纵部队突袭机场之际，进占敌人部队外围主要阵地，取得了初战胜利。

初春的晋南地区，仍然严寒如冬，连日来雨雪交加。徐司令员指挥临汾前线各部队冒着雨雪，四面团团包围临汾城。3 月 16 日，攻占了城外围和城东关外壕外沿的主要据点，以掩盖我军挖交通壕攻击推进，紧缩包围圈。经过一周的准备，拟于 3 月 23 日，由 13 纵队组织攻击，先行夺取临汾城的东关。

临汾的东关很长，从城东门直达火车站。要攻克临汾，必须首先打下东关，在我军攻打东关之前，守敌为发挥火力，把东关紧靠城墙的房屋全部拆除，形成一片开阔地带，以防止我军利用。我 13 纵队 38 旅 3 团在肃清汾河以西的阎军残余武装后，冒着倾盆大雨，从河西开到东关的制高点黄土包下。经过 3 次攻击与反攻击，占领了该高地，摧毁了敌人的暗道。接着，13 纵队以 2 个团的兵力，在两次进攻受挫后，终于攻下东关。

在城南，我 8 纵队 24 旅 72 团于 3 月 7 日突然进抵飞机场。11 日，部队推进到距离城墙 300 米处。

东关为我解放后，敌 66 师被歼，只余七八百人，杂牌部队大部被歼，仅 30 旅尚有战斗力，但其士气沮丧，兵员亦不足。残暴成性的梁培璜等仍不甘失败，一面胁迫士兵为其卖命；一面大肆搜捕城内青壮年和学生补充兵员，强迫居民加修工事，增筑碉堡，将东城墙内 200 米以内居民房全部平毁，挖掘内壕，加修暗火力点，决心死守。

攻占东关的胜利，长了我军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的议员乱成一团，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望他当面答应立即派飞机助战，挽救临汾危机。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在伪“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令国防部次长林蔚叫陈纳德派飞机助战，疯狂轰炸临汾城外我军阵地，并向城内投送面粉、大米、罐头以示援应。

阎锡山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急电守敌总指挥梁培璜死守，并派 61 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座小飞机到临汾传达无力派兵支援，要梁死守临汾的命令。又 3 次打电报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梁培璜有苦说不出，除了表示“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和勒令属下死守城池外，已是无计可施了。

鉴于临汾前线各参战部队多数没有参加过攻坚作战，徐司令员除了有意识地把部队轮流拉上阵地打一打，以得到实战的锻炼外；在 1 个多月来的外围作战包括攻击东关作战中，还十分重视部队战场上的训练，特别重视攻坚的准备。他对各级指挥员说：

“这次我军攻打临汾的战斗，不同于过去的运动战、游击战，而是要打攻坚战，但是我军炮兵少，火力弱；阎锡山却有兵工厂，炮火强，部队除了要抓好射击、投弹、刺杀 3 大技术外，要突出抓工兵训练。全军指战员人人都要熟练地掌握土工作业和爆破两大技术。”他还指出：“攻坚的一套战术和技术，要分解训练，又要配合训练、在战术方面，着重解决战斗队形、小群动作、爆破问题、战场上的军事民主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贯穿于整个战

役之间。”

我军练了打，打了练，充分开展了军事民主活动。所以在临汾前线的部队越战越强，徐司令员这一着，抓得非常正确，可谓具有先见之明。

战役中间，徐司令员不仅考虑整个战役的战斗行动，对于攻击某 1 个重要阵地，他也很关心。尤其多次攻击难以巩固的阵地，他总要找来有关人员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又用来指导部队的战场训练和具体的战斗行动。临汾城东关东门北段外壕外沿有 1 个土垄坎阵地。我军曾 5 次攻击，都被反扑的敌人夺回。徐司令员便调指挥攻该阵地的第 71 团 3 营营长陈克难和攻打该阵地的连长、排长、班长和战士来到他的指挥所，召开战术调查会，总结经验教训。

敌机整天在狂轰滥炸，东关的房屋大部被炸塌，给我军的运动和补给造成很大的困难。为避敌之长，前指指示：和敌人展开地下坑道作战，尔后登城歼敌。

4 月 15 日，“前指”第 3 次调整部署：13 纵队从大南门以东到东南城角，8 纵队从城东南角到大东门以北，太岳军区部队由大东门以北第 2 突出部到城东北角，同时攻击前进，扫除障碍。夺取登城阵地，掩护坑道作业。

随着我军总攻时间的逼近，敌人更加疯狂，除了加强防守，不断反扑外，竟不顾我军警告，向我军阵地施放毒气。由太原、天津、西安起飞的敌机亦日夜轰炸，东关房屋大部分被毁。争夺登城阵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形成了空中、地面和地下 3 层的立体争夺战。

向坑道里装填炸药开始了，从炸药库到坑道口，300 多名指战员排成队伍，冒雨传送炸药。为了炸药不被雨打湿，黄定基首先把上衣脱下来盖在炸药箱上，迅速完成了炸药的传递和装填。同时，23 旅、24 旅的突击团，随即进入阵地，做好攻击临汾城的一切准备。

17 日，夜幕降临，总攻时间到了，随着信号弹升起，引出了两声巨大的轰响，震得大地不住的抖动，浓烟冲天。

坑道大爆破成功了！城墙上出现两个各宽 30 米的大缺口。部队的战术动作协调得很好，坑道爆破、火力转移、步兵冲击，三者一个信号，一齐动作。由 23 旅 68 团、69 团和 24 旅的 71 团组成的两支登城突击队迅速登上城垣，向城墙两侧和纵深发展。

这时，8 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兴奋地抓起电话机向徐向前司令员作了报告：“报告 6 号（徐司令员当时的代号）突击部队乘烟雾石块，不到 1 分钟的时间就登上了城头，突入城里！”

战斗至 24 时，城内之敌完全被我军歼灭。当我军突破城墙后，梁培璜、徐其昌、娄福生等见大势已去，急带一股残军裹胁部分群众仓惶由西门逃生，被我预伏之 30 旅堵截歼灭一部，夺回被裹胁的群众。漏网之敌除娄福生带 400 残敌逃往晋中外，其余被我晋绥部队和 22 旅歼灭，梁培璜等被我军活捉，临汾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5 月 18 日，临汾战役胜利结束，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临汾战役经过 72 天的大战，共歼敌 2.5 万余人，其中俘敌中将副司令梁培璜以下 22859 人，缴获各种炮 534 门、机枪 1254 挺、长短枪 10360 支、汽车 156 部及大批军用。

徐帅“爱兵”的故事

和徐向前元帅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清楚地记得徐帅是如何关心和爱护士兵的。战争时期，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从思想和工作上关心干部战士，部署作战时，始终把干部和战士的安危放在心中，在指挥打仗中尽一切可能把部队的伤亡减少到最小程度。

一次，部队在山西攻打临汾城，在我军实施炮火轰击后，没有把城墙打开，自己的部队还造成了一些伤亡。见攻城不下，前线指挥员用电话请示徐向前，要求搭云梯，强行攻城。徐向前思索了片刻，回答：“用这个方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可考虑改用别的办法，我们要爱惜每一个战士的生命。”他下令停止进攻。

临汾战役结束的工作总结会上，徐向前对指挥员们语重心长地说：“对待战士，我们要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兄弟，当作自己的亲子女一样爱护、痛惜他们。大家想想，老百姓把自己的骨肉从小养大成人，在国家危难中，把他们送到部队里来，交给我们，如果我们蛮干，作战不讲战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怎么向他们的父母做交待呀！你们想一想，要是换成自己的儿女呢？你们也有儿女嘛！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干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但我们要尽量做到减少无谓的牺牲。”在座同志们的心都深深地被徐帅这番满怀真情的讲话触动了。

晋中战役期间，徐向前接到情报，已成惊弓之鸟的 2000 余名敌人准备弃城逃回太原。他立即下令正在清扫战场的第 8 纵队迅速前去歼灭这股敌人，当时 8 纵队已连续战斗了几昼夜，部队在战场上还未集中起来，也没有吃饭，比较疲劳。徐向前听完纵队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后，仍不改变命令，令部队立即出击，结束战斗后再吃饭休息。部队奉命出击，很快将这股敌人歼灭了。徐向前这时才向干部们解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当时你们一叫苦，我就动摇决心，放这 2000 多名敌人逃回太原，守住碉堡，到那时我们再去攻打，那就不只是伤亡几十人的问题，而是几百人、成千人的代价了。所以当时我一定要那样做，这才是真正的爱兵。”

电厂攻坚

1948 年 3 月 7 日，我华野 3、8 纵队和陈赓兵团，对河南重镇——洛阳，发起了进攻。9 日即完成对洛阳的包围。我 31 团担任攻占洛阳发电厂的任务。这个电厂既是洛阳唯一的发电厂，又是洛阳西南角外围的重要据点，打下这个厂对整个战役有着重要的意义。

31 团冒着蒙蒙细雨，以急行军速度赶至攻击出发位置后，于 9 日 23 时，采取夜摸偷袭的战法，对洛阳发电厂进行攻击。尖兵排进至小屯村，当即歼灭了敌人外围警戒的 1 个班，占领了小屯。据俘虏供称，守备电厂之敌为 206 师 6 团的一个营，电厂的工事坚固。团首长即令 3 营 7、8 连，乘夜暗猛扑电厂，部队在一排排手榴弹爆炸声中，突入敌人阵地。守卫电厂的敌人从上下左右以猛烈的交叉火力向我射击。把部队压在外壕内，突破口不能扩大，部队无法前进。拂晓，敌人依托外壕内外明暗碉堡的三层火力网，向我军交叉扫射，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3 营长王志兴同志光荣牺牲。团首长决定撤出战斗，第一次攻击失败。

次日上午，小屯指挥所里一片沉默。这一挫折，对充满胜利信心的指挥

员，确实泼了一瓢冷水。室内电话铃不断地响着，紧急给旅指挥所做了报告，旅首长指示要接受教训，先摸清敌情，然后再组织进攻。面对眼前的情况大家都在思索着，议论着，炊事员送来了早饭，哪一个人都不想吃。突然，团首长定下了决心：“明天部队要实施强攻，要进行强大的火力准备，兵分两路，先以突击排突入外壕，在外壕内侧架梯子强攻，得手后，突击连及后续部队，趁机突入阵地，向敌纵深进击。”这仅是一个原则的方案。入夜，指挥员们做了接敌侦察，询问了负伤同志当时的情况，制定了作战实施方案，组织了突击排、架梯组、投弹组，集中了全团的火力分队，并对部队进行了再战动员。经过一天的准备，12 日上午攻击开始，在强大密集的炮火准备之后，突击排顺利地突入了敌人的外壕，正准备在壕底内侧架梯子时，敌人外壕内外的三层火力网，一起向我突击排打来，战士们发扬了英勇顽强的精神与敌展开了拼死的战斗。但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处，又受到外壕的地形限制，敌人能充分发扬他的明暗火力。所以，我们的同志又一个个地倒下了。指挥员见到架梯不成，估计到外壕内的情况一定是极复杂，部队才难以突进。随即下令停止攻击，但已突入外壕的几个同志怎么办呢？撤，无论如何是撤不出来的，外壕内的枪声、手榴弹一阵接一阵，战斗还十分激烈。大家都在关心着那几个同志的处境。是啊，他们一定十分艰难！大家以焦急的心情，预测着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幸事情。一阵枪声后，又沉默下来，随后又是一阵枪声，只听见敌人高喊：“你们出不去了，投降吧，给你们留一条活命！”接着是一排手榴弹爆炸声。就这样，一阵急，一阵松地持续的打了好久。

这时，在外壕坚持战斗的同志们经激烈战斗，最后只剩下 7 个同志了。多数已经负伤，他们在排长陈忠信的指挥下组成了一个战斗班，在外壕的内侧，敌人不易射击到的地方，挖了猫儿洞（避弹坑）和敌人继续战斗，开始敌人射击，我们不管他，敌人喊话，我们更不理睬。接着敌人组织小股兵力，在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人扑来，我们一阵排子枪或是一排手榴弹，向逼近的敌人打去，4 个敌人倒在地上，其余的怆惶逃回地堡。但敌人死不甘心，总想把我们 7 位英雄消灭掉。就这样你来我往，连续打了许多个回合，敌人每次攻击，总要丢下几具尸体，始终未能接近到英雄们的身边，从上午到天黑，一直坚持了十多个小时。连续的战斗，负伤、流血，又饥又渴，战斗到后来，每个战士确实精疲力尽了，但仍然顽强战斗。天黑了，枪声也停止了，7 个同志，互相帮助，互相搀扶，爬到壕边，架起梯子，用绑腿把伤重的同志们吊出了外壕，爬回到自己的阵地。眼巴巴盼望着的首长和同志们，见到满身是血的英雄时，心情格外激动，紧紧地握着英雄们的手，流出了敬佩、难忍的热泪。

在指挥所里，陈排长他们向指挥员们详细介绍了敌人在战壕里设防的情况和与敌人坚持战斗的经过。这是多么难得的敌情呀！它是用烈士们鲜血换来的，是何等的宝贵啊！团指挥员根据陈忠信同志的汇报，又组织各级指挥员反复进行了侦察，基本上弄清了敌人整个设伤情况：发电厂，是敌洛阳西南外国重点防御阵地，工事久经建筑，十分牢固。外壕内外，阵地纵横，战术火力配备非常科学，整个阵地，上、下、左、右、高、低、明、暗，组成了一个整体的火力网。全阵地由四个集团工事构成，每个集团工事又有三个碉堡群，每个碉堡群，又由几个三角形或梅花形的子母碉组成。所有明碉暗堡，均由交通壕连接。全阵地，大小碉堡有 60 多个，各碉堡均配以轻重机枪为骨干火力，火力配备分上、中、下、明、暗多层，上控制地面，下控制外

壕，互相结合，组成严密的火力网，并以侧射火力、潜伏火力，封锁要道和死角。阵地周围有一道宽 8 米、深 4 米的外壕，壕内多处构有通向壕内地堡群的通道。从壕底到地面设有三层明暗火力点；外壕的外面架了两道屋顶形和三桩形的铁丝网，并设有布雷区和拒马。从布雷区、铁丝网，到外壕，再到阵地纵深的核心地区，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牢固的环形阵地，据说这是美国顾问和 206 师师长邱行湘共同设计建筑的，曾获得邱行湘“固若金汤”的奖旗。

在这样的工事前面，又有了前两次攻击受挫的教训，应该怎样打呢？团指挥所集中全团官兵的聪明才智，决定集中数十门山炮、没良心炮（炸药发射器）、迫击炮、六零炮和全团轻重机枪从三面轰垮敌人的表面工事；在火力掩护下采用大药量的连续不断大爆破，摧垮突破口附近的外壕，埋掉壕内的暗火力点；制作长竿手榴弹束（把数枚手榴弹捆在长竿上）和长竿燃烧熏烟器，以备打敌人的地堡；选择西北、西南二个突破口，兵分两路进攻。作战方案确定后，旅团首长又亲自到各连队作战斗动员和思想工作。

13、14 日，整整做了两天的准备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后，14 日下午，发起第三次攻击。16 时下达攻击命令，数十门火炮和所有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顿时整个敌人阵地浓烟滚滚，成了一片火海，表面工事几乎全被摧毁。接着，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工兵排长景金旺，带领三个爆破组在阵地两角，同时实施连续的大药量爆破，30 公斤、60 公斤、80 公斤……一批批炸药包，在敌人外壕内爆炸，团团浓烟夹杂着泥土腾空而起，巨大的声响和摧毁力把一段外壕炸成了斜坡，把突破口附近的暗火力点都埋在了土下。第 3、4 连的突击队乘滚滚浓烟，在一排排手榴弹的爆炸声中迅速突进了敌人的阵地。残余的敌人失去了依托，又迷住了视线，狼狈弃阵而逃。2 营长祁大海看到这有利形势，立即令部队向纵深冲击。3 连在突入敌阵地后，也向纵深发展，一捆捆的集束手榴弹、长竿手榴弹和熏烟器，在敌人的地堡内不停的爆炸、燃烧，再加上密集的机枪火力，使敌人无法继续抵抗。部队从南北两面，沿着围墙向敌人的核心阵地进行钳形夹击，数十个碉堡群，所有的集团工事，均被摧毁了。敌人四面遭到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到黄昏时分，固守发电厂的敌人全被歼灭，共击毙敌营长以下近百人，俘敌 270 余人，战斗胜利结束。

彭德怀妙计克宝鸡

1948 年 4 月初，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杀出黄龙山，直向关中重镇——马栏镇奔去。

满山遍野的山丹丹，顶破僵硬的冻土，迎初暖还寒的春阳，在风中摇拽，顽强地生长着。

4 月 13 日，总部在马栏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西府战役的作战方案。会上，彭总对大家说：

“打洛川没得把胡宗南调出来，这次我们打西府，目的还是在于调虎离山。这就叫做一计不成再来二计。只要我们能把敌人从西安、延安和渭河两岸调出来，我们就可以寻找战机消灭他。你们不要背上包袱，打仗嘛，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扎手的时候。我们当指挥员的就是要经得起胜利，也经得起失败。当初胡宗南占领了我们延安，看起来我们是失败了，现在我们搞到他

屁股后面来了，杀他的回马枪，夺宝鸡，捣他的后方，搞他的补给站，叫胡宗南火冒三丈高，看是谁的胜利？这样一打，第一可以补充我们自己，第二又可以光复延安。同志们，不久我们还要占西安、南京、上海哩。”

在阐明了西府战役的指导思想之后，彭总又具体布置了作战任务：

1、2 纵队进攻宝鸡；3 纵队配置于关中马栏以南柳林镇、小丘镇、官庄、黄堡、耀县等地区，以保障野战军主力东南方向的安全；4 纵队担任野战军的后卫，对尾随之敌实施阻击；6 纵队插向西兰公路，夺取彬州、长武、灵台一带地区，牵制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保障主力右侧，并作为尔后回师之跳板。

4 月 17 日，西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从马栏地区出发，向泾渭河之间的西府地区进军。

彭德怀进军西府、夺取宝鸡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所侦知。1948 年 4 月中旬，国民党宝鸡警备司令刘进急忙调兵遣将，将宝鸡市区和渭河、金陵河一带地区划分为 5 个守备区，并指定了五个守备司令官，分区负责，坚决防守。作战总指挥由刘进本人担任。他们征调了几万民工，派遣了不少部队，急急忙忙地构筑碉堡阵地，还做了钢筋混凝土重掩体。重点工事在县城以北制高点金陵源上，即旧飞机场。

4 月 20 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逼近岐山、麟游、凤翔一带，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电令刘进指挥驻宝部队第 76 师徐保部、宪兵、警察、专署和县保安团队，坚守宝鸡，等待援兵到达。

刘进因自己无直属部队，赤手空拳，光杆司令一个，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大敌当前，只得让“贤”，由整编第 76 师师长徐保担任宝鸡市区的守备责任。

4 月 24 日午间，据报西府情况甚急，76 师参谋长袁致中和参谋处第一科科长李如彬研究后，决定派参二科参谋张廷吉带电台一部即时出发，赴凤翔收集情报。

当日下午 5 时左右，徐保由西安到宝鸡，未到师部，就在他的休息室召集袁致中研究敌情，并与宝鸡警备司令刘进商讨对策。当时刘进的意见是：宝鸡的兵力不足，难以防守，可以放弃宝鸡，将所有的兵力撤到宝鸡以南的宝成（由宝鸡到成都）公路秦岭上，占领要地，抵御来攻的共军。

徐保被称作胡宗南的“四大金钢”之一，是胡宗南的嫡系和得力干将。对于宝鸡，他决心固守。

刘进借机将宝鸡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县政府及其他行政人员，撤到益门镇以南地区。

当夜 10 时左右，徐保接胡宗南电：以现有兵力，竭力坚守，令马家军星夜增援。

这时徐保大骂刘进是胆小鬼，怕死，党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形势不好，夹着尾巴跑了，真是对不起胡宗南的培养。

最后徐保恶狠狠地对身边的参谋长袁致中说，他决心要和共军周旋下去。

其实，当时徐保已经把吉普车准备好，加足汽油，捆好行李，大概也想看情况行动，在接到胡宗南电报后，才决心死守宝鸡。

他到参谋处布置了一番，指示留下五六个参谋外，其余都可撤走。徐保这一决定使袁致中犯了难，留谁呢？大家都想走，只是嘴上不说罢了。最后，

袁致中只得留下五、六个好说话的参谋，让其余人员快速撤走。

4 月 25 日凌晨，师部转移到金台观，这里地势较高，一眼可通观宝鸡全景，在这里指挥是比较有利的。可见，徐保也不仅是只会吃干饭的草包，倒还懂点战术。重新布置好以后，徐保一面令特务营赶筑工事，一面备足粮弹，准备决战。

26 日上午 9 时许，1 纵、2 纵开始攻城，顿时枪声四起，宝鸡的高大楼房也都成了阵地。

徐保见解放军多于己数十倍，援兵又没有消息，顿时傻了眼。

正在危急之际，正好从西安开来的铁甲车队长向徐保建议：将师部迁移到铁甲车上，可以指挥自如。还说，铁甲车上装有小型炮，弹药充足，还有 3 天的给养，凭借铁甲掩护，东冲西拦，可以确保安全指挥。

徐保闻听大喜，放下师长的架子，拍着铁甲车队长的肩膀说：“老弟，你是临危救难呀！只要宝鸡能坚持着，战后我保你官升两级。”说毕，立即命令参谋通知工兵营坚守东堡子及车站一带阵地，掩护师部向铁甲车转移。

徐保带了一个连迅速地跑到铁甲车上。

徐保的意图是要往西逃跑，但是铁甲车仅开出数里，西面即发现解放大军，并将铁轨拆毁数根，铁甲车无法前进。

这时，徐保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瞎撞乱窜，往西不通，就赶紧下令往东开，刚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路轨已被拆断，又不能前进，这时司机、司炉已被打死 4 人。

铁甲车开到此处，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这时，桥头附近的解放军迅速冲来，喊声震天：欢迎投降，优待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徐保已惊魂落魄，不知所措了。参一科科长李如彬向徐保建议：

“速带少数人跳车突围，涉渭河向南逃跑。”

徐保同意了这个办法，就和参谋长袁致中商议说：

“眼看大势已完，我先撤出，你在车上继续作战。”

袁致中一看徐保要逃，哭丧着脸说：

“师长，我的家小在西安，万一我尽忠了，请师长多加照顾。”

这话激起了徐保的愤怒，厉声说：

“那么你突围渡河去，我留在车上，一个革命军人还怕死么？”

袁致中听后只好说：

“师长，你快准备吧，再迟一会儿更不好突围了。”

徐保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大意是：

“我决心尽忠……。”

发完电报，徐保令无线电排将密码烧掉，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一本一本的都撕毁。

一切准备好，徐保环顾一下铁甲车内壁，一阵狂笑之后，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说：

“不想我徐保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

他手持手枪，刚走到铁甲车的门口，一个炮弹轰的一声炸响，他即应声倒在了车厢内，满身是血。

包围铁甲车的解放军，在铁甲车底已满积柴草，并再三警告，如不投降，就要放火烧车，至此，袁致中才被迫表示愿意投降。

东堡子的工兵营早在两小时以前，也被缴械投降。

被炮弹击伤的徐保经急救无效，于数小时后死亡。

宝鸡战役旗开得胜，不到半天功夫，战役结束。歼灭徐保部 2000 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使我军 1、2 纵队的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胡宗南得知徐保被打死的消息后，兔死狐悲，在西安专门为徐保及先前被解放军打死的刘戡、严明三个人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当时西安的学生，曾给追悼会送去了这样一幅挽联：

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平身先死，”

下联是：“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

横额是：“纪律严明。”

一个深谋远虑的建议

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常胜将军”粟裕的一个远谋深察、独具慧眼的战略性建议，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策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8 年 1 月，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率华东野战军 1、4、6 纵队渡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江北敌军回师江南，调动分散敌人，减轻中原我军压力，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并且要求他“熟筹见复”。

原来，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就有一个在适当时机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想，即：以“两个跃进”而推动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第一个跃进便是派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过黄河，挺进大别山；第二个跃进就是派粟裕同志率领华野 3 个纵队南渡长江，直捣浙赣。这样就可把解放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现在第一个跃进已取得成功，第二个跃进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在敌人以 33 个旅的兵力围攻大别山区刘邓主力，中原斗争形势趋于紧张复杂的时候，及早分兵实施第二个跃进以调走分散部分敌人，显得更加迫切。

粟裕接到电报后，马上意识到，中央军委、毛主席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对中原和华东战场，乃至对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粟裕自受命之日起，一方面积极进行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派出 1 个加强营并带干部 200 余名，前往皖南；另派原皖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带百余名干部到中原局，请中原局分配他们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还派原新四军第 7 师参谋长孙仲德带一批干部到含山、和县、巢湖地区组织水上工作等等。另一方面他对军委的电报进行了缜密的思考。

粟裕感到，渡江南进，固然会给敌人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可以调动一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蒋介石决不会把他在中原地区拥有比较先进的重装备的主力部队开到江南去同我们打游击；为防“放虎归山”，更不会把有战斗力的桂系国民党部队调往江南。如果只是调走一些二三流国民党部队，中原我军所受到的压力不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因为从中原调走几个坚强的主力纵队，而削弱自己的突击力量，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使我军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华东战局。更何况我 3 个有重装备的纵队过江后，完全是无后方作战，没有弹药供应，重装备不仅不能发挥威力，反而会成为累赘。此外还有伤员安置、粮食筹集等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些都会严重削弱部队战斗力。鉴于这种情

况，不如暂不过江，争取趁敌兵力大为集中之际，寻机歼灭其几个主力兵团后，再行南下为好。

为了慎重起见，粟裕尽管有这些想法，但没有很快提出来。因为他清楚，这个意见提出来，就等于要更改中央的战略部署，更何况中央关于派遣粟裕渡江南进的决定，华东局——领导都是积极拥护的。陈毅曾就此决定写了“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光擒王。”“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提不提这个意见，粟裕确实有些犹豫不决。这倒不是他不懂党内的民主精神，也不是怕别人误解他怕困难而不到江南，而是他考虑的是如何推动战局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根本就不掺杂个人的得失安危。这就是粟裕的性格！他担心的是自己“恐有不周”，干扰了中央的决策。但他又想，作为一名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粟裕终于消除了顾虑，以一个战略家的胆识和必胜的保证，于 4 月 18 日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电告中央。此时，陈毅正由西柏坡返回濮阳，准备对部队渡江南进进行动员。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电报后，立即来电要陈毅、粟裕一同到中央当面汇报。

4 月 28 日，陈毅、粟裕一起赶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主席亲自迎出门来。随后，召集中央五大书记及陈毅、薄一波、李先念等同志听取粟裕汇报。

粟裕面对最高决策领导们，侃侃而谈，将自己的建议和盘托出。他说，鉴于目前的战局形势，我认为暂不渡江南进，应集中兵力在江北打几个大仗，尽可能多地将蒋军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理由是：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太岳兵团）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在听取了粟裕的详细汇报后，中央立即进行研究并得出共同一致的结论，即改变原来“渡江南进”部署，决定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粟兵团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以粉碎敌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歼灭蒋军的有生力量。

战争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粟裕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人民解放军向敌人发起频频进攻，在长江以北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之后，中原和华东的战略形势顿时改观。在某冲意义上可以说，“中原会

战”是以后规模更大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之前的一次实战演习。

领袖与士兵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警卫战士，战士们也非常地爱戴自己的领袖，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毛主席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一路上，警卫排的战士们形影不离地跟随在毛主席身边，忠心地保卫着自己的领袖。

途中，毛主席非常关心警卫战士身体健康，甚至连战士们的吃饭、睡觉、烫脚等事情都要过问。

有一天，警卫战士小李的痔疮犯了，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仍装着像没事一样照样行军、执勤、站岗。但在行军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异常的走路姿式还是被毛主席发觉了。

“小李，你生病了吗？”毛主席关切地问。

“报告主席，我挺好的。”小李挺着胸脯大声地回答。

“主席，小李的痔疮犯了”旁边的小刘忍不住悄悄地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十人九痔，不要紧的，到了西柏坡让大夫看一下就好了。但你现在不能再走路了。”说着就让警卫排长把马牵了过来，经过再三的劝说，小李才上了马。

骑在马上，病痛的折磨减轻了，但小李的心里却格外的不安。不堪回首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涌上了心头。

他出生在穷山恶水的涉县山区，一家三代都为地主扛活，从未吃饱穿暖过，唯一饱受的是地主的皮鞭和凌辱。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扫荡，杀死了他的亲人，烧毁了他的家，小李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是毛主席、人民军队救他脱离了苦海，参军后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幸福。眼下自己一个普通战士，生点小病毛主席就把他的马让了出来。他越想越觉得不能在马上了，于是翻身跳下马来，至于痔疮还疼不疼，他一点也没觉出来。

毛主席见他跳下马来，装着生气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把身体搞坏了，以后还拿什么去革命呀？”说着亲自扶小李重新上了马。

小李骑在马上，激动的说不出话来，热泪一滴滴的落在了马背上。从那以后，每当谁生病或受伤，毛主席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们。时间一长，大家都戏称毛主席骑的那匹大白马为“公用坐骑”。

纷飞的大雪终于停了，雄伟的太行山银装素裹，更加壮丽。

冒雪行军一天后，傍晚时分部队在这白雪皑皑的太行山里宿营了。

雪后的天气格外寒冷，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在毛主席住所外面，忠于职守的警卫战士小陈，手握钢枪，迎风挺立，十分警惕地为主席站岗。

夜深了，主席屋里的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把周副主席等首长送出门外，回身看到了小陈一动不动地站在寒冷的屋外，眉毛上结了白霜，便把自己披着的棉大衣拿下来要给小陈披上，小陈哪里肯要，一个劲地说：“主席，我不冷，还是您披吧！”毛主席亲切地说：“我在屋里办公，比你在外面站岗暖和，穿上吧！”说着，亲手把大衣披在了小陈的身上，并交待说：“告诉战士们一声，以后夜里不管谁站岗，都披上它。”

从此，警卫排的战士们，在冬天，谁夜里值勤站岗，谁就披着毛主席的

这件棉大衣。

主席的大衣变成了值勤大衣。

1948 年夏初，毛主席考虑到全国解放后工作上的需要，决定让部分警卫战士去离西柏坡 20 余里的霍宾台参加中央机关文化补习班的学习。下午就要出发了，毛主席决定中午在中灶食堂请上学的同志吃饭，为他们送行。

开饭的时间到了，战士们围在毛主席身边又说又笑，又唱又跳，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一样分外地高兴。可是小马却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那里。

大家都很纳闷，毛主席关心地问：“小马，你怎么不高兴哩？”小马眼圈一红，竟哭了起来。

原来，小马出生在陕西省绥洼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未上学，直到参军，连自己的名字还不认识。给毛主席当了警卫战士后，毛主席每天教他认三个字，现在又送他去学习，他是又高兴又留恋，现在就要离开毛主席了，所以心里很难过。

毛主席看透了小马的心思，微笑着把他拉到身边接着便招呼大家围桌坐下。毛主席拿起筷子向大家举了举说：“来，开饭。”

毛主席边给大家夹菜，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送你们去学习，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工作。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饭后，毛主席应战士们的要求，在他们的学习本上题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两句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最后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年轻的警卫战士们紧紧地偎依在毛主席身边，脸上充满了无限幸福的笑容。

在一个周末的夜晚，参加文化补习班的警卫战士小李、小马、小张和小王，静静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和闪烁的北斗，久久不能入睡。不知过了多久，性格内向的小马轻轻说道：“真想念毛主席啊！”

小马的一句话，在战友们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性格直爽的小张说：“我昨晚做梦还梦见了毛主席，高兴我都哭了。”

小李说：“明天是星期天，咱们去西柏坡。”

小王激动地说：“对！看望毛主席去。”

大家统一了看法，便不再说话，想早点睡，早点起床，可他们谁也不能入睡，一提看望毛主席精神更兴奋了。停了一会，小马又说：“明天见到毛主席，咱们向他老人家说什么呢？”大家齐声说：“就说咱们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们不仅能看书读报了，还可以写信了。”

“咱们给毛主席带点礼物吧？”小马又提议道。

大家一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最后一致决定，明早到河里摸些鱼，送到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中灶食堂，给毛主席改善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四人拿着铁锨、水桶、筛子等工具，跑到了村南的小河里摸到了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早饭后，他们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眼，提着鲤鱼，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西柏坡，把鱼交给了饮事员老李。正在这时，毛主席开完会路过食堂，他们见到毛主席，高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主席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表扬了他们的进步后，又问他们那来的活鱼，他们把摸鱼送鱼的心意说了出来，并诚恳地说：“主席，今天这鱼您可得吃呀！”

毛主席看了看他们，高兴地说：“好！今天改善生活，吃红烧鲤鱼。”说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下半晌，他们四人迈着轻快的步伐，唱着歌儿心满意足地返校了。

送钱

一九四八年夏初，西柏坡的乡亲们迎来了翻身解放后的第一个大丰收。望着这片真正属于自己的丰收土地，乡亲们心里充满了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

今天是端午节，乡亲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开镰收割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带领部队和机关人员前来帮忙。整个西柏坡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麦收场面。挥汗如雨的军民，割的割、捆的捆、挑的挑、拾的拾一片祥和丰收的景象。

临近中午时分，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小战士挑着两大捆麦子从村南的田间小路上颤颤悠悠地快步走来。他就是参军不久的新战士小东。今天他帮助贫农阎大娘家收麦子，当他走到阎大娘的菜地边时，“ 呲留 ”一声，脚下一滑，差点摔倒，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堆鲜嫩的韭菜，被他踩得乱七八糟。小东正着急，阎大娘赶来了，看到小东满脸通红，身上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心痛地说：“ 傻孩子，别干得太猛，看把你累的，快擦把汗，渴口水，休息一会儿。 ”说着一边替小东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递给了小东一碗糖水。最后才指着那堆韭菜说：“ 一堆乱韭菜，没哈，别往心里去。 ”

小东喝完了水，把嘴一抹，说了声我不累，就挑着担子又飞快地走了。

晌午了，小东扛着扁担要回机关去，刚走出麦场，阎大娘抱着一捆韭菜拦住了小东：“ 小同志，今天是端午节，又是开镰割麦的大喜日子，你把这捆韭菜带回去，让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同志们尝尝鲜。 ”说着就把韭菜往小东手里塞。

一向机灵的小东，这时不知咋办了，他一边推着韭菜，一边着急地说：“ 大娘，使不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的纪律呀！ ”

阎大娘一听，深情地说：“ 自从你们来到西柏坡，帮着俺干这干那。今天又帮俺收麦子，可从来没吃过俺一口东西，大娘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再说，一捆韭菜，也算不了啥，可俗话说‘ 瓜子不饱是个心儿 ’这也是大娘的一片心意啊！ ”说着，大娘的眼圈红了。

听了阎大娘的一片真情话语，再看看大娘伤心的样子，小东可真有些为难了。要韭菜吧，违犯纪律，万万使不得，不要吧，又怕伤了大娘的心。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从收工的队伍里传来了一阵嘹亮的歌声：“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 ”小东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顺手掏出了五毛钱，对阎大娘认真地说：“ 大娘，让我拿走韭菜也行，但您必须收下钱。 ”

“ 收钱？ ”阎大娘先是一楞，但立即想到军队的纪律那么严明，不收钱小东是不会拿的，阎大娘想了一下，也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他笑呵呵地对小东说：“ 好吧，按市价收钱，每捆韭菜一毛。 ”

不了解价钱的小东，听阎大娘一说，就拿出一毛钱递过去，这才接过韭菜高高兴兴地向中央政治局大院走去。

刚进大院，就碰见周副主席迎面走了过来。周副主席关切地对小东说：“ 小鬼，累不累呀？ ”，小东胸脯一挺：“ 报告首长，一点也不累。 ”看着小东那带稚气的红脸膛，周副主席爱怜地拍了拍小东的肩膀。接着，又指了指小东手中的韭菜问道：“ 这是从哪来的？ ”

于是，小东就把这捆韭菜的来历说了一下，最后还红着脸向周副主席报告了给人家踩坏了一堆韭菜。

周副主席听了，接过韭菜掂了掂说：“ 韭菜市价每斤一毛钱，这捆韭菜足有三斤，再加上你踩坏的，一毛钱够吗？ ”

小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周副主席抚摸着小东的头，亲切地吩咐说：“ 把韭菜送到伙房，吃了饭给阎大娘送钱去。 ”说着，从兜里掏出了五毛钱递给了小东。

出其不意打开封

1948 年 6 月 15 日，粟裕定下了豫东作战的决心。即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河南省会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寻歼来援之敌的一路。

6 月 17 日晨，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上述部署，并指出：“ 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 ”，“ 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这一指示，表现了对粟裕的充分信任。

我军攻打开封这一着棋，由于是抓着难得的战机当即立断之举，完全出敌意料之外。当我军的兵力部署已经就绪，战役即将发起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 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作战，“ 在开封无真正战斗 ”。

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 剿总 ”，还坚持说我军第 3 和第 8 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 小诸葛 ”白崇禧也失算了。

再说陈士榘、唐亮率领的由第 3、第 8 纵队组成的西线兵团，于 6 月 15 日行军经过黄泛区，进到了圉镇地区，中午休息时间，接到中央军委和粟裕的命令，要陈士榘、唐亮立即布置攻打开封。陈士榘、唐亮立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待命，随后召集各纵司令员和政委到兵团指挥部驻地开会，传达上述命令，同时研究作战部署和打法，并草拟安民布告，宣布城市政策，入城纪律和注意事项。

开封，位于黄河下游大冲积扇的南翼，往南是陇海铁路，靠北是滚滚黄河，西面毗邻郑州，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是我国的六大古都之一。城内那历代保存下来的铁塔、繁塔、相国寺、龙亭、禹王台、延庆观等名胜古迹，不仅记载着这座城市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向人们说明了这座城市既是南北争夺的中原重镇，又具有中原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

开封城内守敌为 66 师师部率 13 旅全部和河南省保安第 1、2 两个旅及炮兵部队、后勤机关等约 4 万人。

6 月 17 日，我军接近开封后，陈、唐下达了发起攻击开封外围的命令。部队总结了过去的打法和经验，力求以奔袭手段占领各关，尔后有依托地迅速突破城门进行速战速决，争取三至五天内解决战斗。

于是，我军 6 万，开封国民党守军 4 万，进行一场血与火的激战。

在开封守敌节节败退、处境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借助飞机轰炸来威胁我军，提高士气。蒋介石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不惜一切代价轰炸开封。仅 6 月 20 日一天，敌机就在开封投弹 20 吨左右，开封女师 700 名学生中，就有 400 人惨遭敌机火力杀害。《合众社》报道说：“ 蒋机轰炸开封的结果，已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六七万之众。 ”

为了保护居民安全，我军一突进城内，立即命令部队打开城门，组织和协助群众向城外安全地带疏散。敌军不仅昼夜进行野蛮轰炸，而且临死前在城内外商业繁盛街区及文化机关区域到处纵火焚烧，肆意抢掠，甚至枪杀救火群众。当我军入城时，到处火光冲天，尸臭难闻。

尽管敌人施行种种残酷野蛮的手段，也挽救不了他们的败局，省政府很快拿下了。这个钉子一拔，守敌顿时乱了阵脚，有的逃命，有的投降，有的居然溜入监狱，想化装成犯人逃跑，结果全部被我军就地监禁。

堂堂的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逃命心切，更是独出心裁。他用鸭血涂抹全身，装成一个受伤的老“教授”，由他卫士的老婆扮作女儿，然后爬上一辆独轮车，混在疏散群众之中溜出了开封。

开封战役已近尾声，残敌狗急跳墙，还在拚死抵抗。原来开封战役打响后，蒋介石立即赶赴郑州、西安、徐州等地督阵，一面电令开封守敌与古城共存亡，固守待援，不准突围；一面速调 75 师、5 军、18 军等部增援开封，以便对我军攻城部队进行反包围。

这时敌人的各路援军已在蒋介石的严令催督下逼近开封，连远在百里、数百里之外的山东、苏北、淮南的 83 师、72 师、25 师、63 师也都拚命赶来。敌人各路援军不惜血本向我阻援部队猛攻，阻援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6 月 21 日，开封守敌已能隐约听到增援部队的炮声，因此更加疯狂顽抗，梦想逃脱被歼厄运。

鉴于这一情况，我军重新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用缴获敌人的大量炮弹予敌以歼灭性轰击，一口气吃掉残敌。最后的攻坚任务，交给 3 纵 8 师的“郭继胜连”和 8 纵的一个连去完成。

我军集中 600 多门大小火炮，向龙亭阵地猛烈轰击或抵近直接瞄准射击约半小时左右，敌人的野战工事和绝大部分钢筋水泥工事被摧毁。大部分敌人亦被炮火消灭或震昏。为了保护龙亭古迹和加强炮火直射命中威力，炮兵冒着生命危险抵近射击，爆破手也出生入死炸掉了挡道的地堡，攻击的道路打通了。

我军两个连队很快在龙亭上胜利会师，开封战役胜利结束了。我军共消灭敌军 3.9 万余人，活捉了敌 66 师少将参谋长游凌云、13 旅少将旅长张洁，恶贯满盈的 66 师中将师长李仲辛被我追击部队击毙在城墙下。另外缴获了敌人大量粮款弹药。

临空督战战亦败

1948 年 6 月下旬开封被我军攻克以后，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以进至徐州的整编第 25 师改援兖州外，令邱清泉兵团（调出整编第 75 师，调进整编第 83 师）及第 4 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 75 师、第 72 师和新编第 21 旅组成一个兵团，以区寿年任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军决战。

我华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粟裕的“动敌”之计。于是，在我军攻占开封后的第 3 天，粟裕便毅然决定主动放弃该城。

粟裕此着又高敌一手：敌人既然想要开封，我军便将计就计，把开封暂

时回让给它。这样既能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又能使我军集中力量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

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在两路援敌中，以围歼后路较弱即区寿年兵团更有把握。但这时两路援敌相距较近，我军必须先引诱其拉开距离，将两路援敌隔开，以创造歼敌的战机。

要拉开两敌之间的距离，就要使敌人听从调动，这当然并非易事，因为我军指挥员毕竟不是敌人的指挥员。但粟大将军自有办法。

为实现这一决心，粟裕决定，以 4 个纵队，即第 1、第 4、第 6 纵队和中野第 11 纵队，组成突击集团，由叶飞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其余部队由野司直接指挥。以 5 个纵队担任阻援，即第 3 和第 8 纵队先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行动，故意示形于敌，让敌以为我怯战而撤出开封，引诱邱兵团进开封，待邱兵团进入开封，与区兵团拉开距离后，立即掉头向东，会同由上蔡地区北上的第 10 纵队和位于杞县的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筑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阻止邱兵团东援；中野第 9 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郑州东援之敌，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另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破袭陇海路徐州至民权段，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

根据敌情的可能变化，粟裕对集中歼灭区兵团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如敌继续由睢县、杞县间向河阳镇、长岗集攻击前进，就将其合围歼灭于马头集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方案是：如敌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我军各纵队则分别跃进，将其分割包围于民权、睢县、杞县之间地区，予以歼灭。

这样，不论区兵团是前进还是徘徊，都将难逃被歼的命运。

对上述战役决心和部署，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示指出：“部署甚好。”

6 月 26 日晨，我第 3 和第 8 纵队按预定计划，由开封城郊向通许方向转移，诱邱兵团西进开封；第 1、第 4 和第 6 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

敌人果然上当，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元气已伤，必须休整补充，不会有积极行动。因此，敌陆军总部将第 25 师经徐州北进，准备解究州之围；同时，以邱兵团会同刘汝明部东进开封，以区兵团向睢杞地区前进，企图乘我军疲劳之际，压我于通、扶黄泛区寻求决战，达到巩固开封的目的。

睢县和杞县位于商丘以西、开封东南，两县毗连。这个地区一片平川，树木稀少，土质松软，做不起鹿寨障碍和坚固的野战工事，一般大庄子都有破旧的土围寨，围寨外的壕沟，平时一般都干涸无水，所以一向就有“古战场”之称，如今，我人民解放军又要在这座古战场上创造新的辉煌战绩。

27 日下午，我东线部队根据粟裕的命令，在叶飞指挥下全线出击。

28 日入夜之后，战斗更加激烈，十几里狭长的空间，几乎被炮弹、枪弹的烟幕塞满，空气也似乎发热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你再有经验，也难以从枪炮声中辨清敌我。竟发生了敌人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趣事：东面敌 72 师的炮弹从我军头上飞过，正好落在西面敌 75 师的阵地前沿；75 师不甘示弱，连忙集中火力还击，不知对 72 师还击了多少发炮弹。后来打得难解难分，还请出了他们自己的飞机助战，其混乱状况可想而知。

睢杞战役一打响，惊魂未定的蒋介石愈加慌乱，开封失守，已经使他狼狈不堪，若睢杞再败，那就更加丢脸。急得他三番五次地登上座机飞临战区，

以军法威逼邱清泉兵团迅速向东驰援。

邱清泉的第 5 军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步炮协同好，下层军官战术思想灵活，部队战斗力比较强。邱兵团想凭借实力突破我军防线，解救他们的难兄难弟区兵团。我 3、8、10 纵指战员早就对 5 军恨之入骨，就是要砸碎这颗“硬核桃”，真是冤家路窄，一场恶战爆发了。

5 昼夜过去了，尽管敌人多次偷袭、冲击，邱兵团仍未越过我军阻击线。

这一下，南京国民党国防部惊慌失措不必描述，蒋介石也坐不住了。7 月 2 日，他不惜以统帅身份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杞县上空督战，严令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并急令已由徐州北援兖州至滕县的敌整编第 25 师火速西调，凑集第 3 快速纵队、交警第 2 总队，组成 1 个兵团，由黄伯韬任兵团总司令，日夜兼程驰援睢县。

我军在大平原上以少敌众、激战 10 昼夜，打退了敌 5 军飞机大炮和所谓“肉弹战术”的强攻，不仅坚守了阵地，还照样缴枪、歼敌、捉俘虏。10 天来，敌 5 军、83 师尽管付出了 1.5 万人的伤亡，但还是始终停滞于杞县近郊，虽然与区兵团相距不到 20 余里，照样一筹莫展，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被歼被俘而无可奈何。

7 月 6 日，敌情起了变化，敌整编第 5 军已从杞县向东北威胁我军侧背；整编第 18 军先头已到淮阳，第二天可到太康，大炮也就可以打到我军背后了；敌整编第 74 师也已到达宁陵东北。

敌变我变，打仗精明的粟裕，果断决定趁胜收兵，睢杞战役以歼敌 5 万余胜利结束。敌兵团司令区寿年也被我军活捉。

7 月 11 日，党中央，毛主席给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兵团等 5 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晋中鏖兵大战，先斩阎军“亲训”

1948 年 5 月，晋冀鲁豫部队攻克临汾，杀出威风，山西境内的敌人，处境愈加不妙。

这时，徐向前第 1 兵团的兵力，包括 8 纵、13 纵、太岳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 46 个团，6 万余人。

阎锡山的兵力，除大同驻守 1 个师外，尚有 3 个集团军（5 个军 14 个师）、3 个总队、22 个保安团、21 个警备大队，共 13 万之众，盘踞省府太原及晋中平川地区。敌人处于我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中，形同孤岛，战略上居劣势地位，已是显而易见的弄实。 但另一方面，阎军兵力比我第 1 兵团兵力多一倍以上，武器装备好，机动能力强，有现代化的城防工事作依托，在战役战斗中尚能形成优势于我第 1 兵团兵力的地位。

这也就是说，敌我双方，各具相对的优劣条件，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经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不大量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便无法形成我军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完成解放全山西的任务。

阎锡山要抵抗我军的战略反攻，保巢图存，首先就要解决军粮问题。13

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 1 斤半粮食计，每月即需消耗粮 585 万斤。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口粮，又何止千万斤、万万斤！如此庞大的粮食需求量，对阎锡山的战略防御计划来说，无异是最头疼的地方。

时近麦熟季节，晋中平川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保粮、抢粮、屯粮，“保卫晋中”，便成为阎锡山实行战略防御的关键所在。敌以 33 军置于祁县、太谷地区，34 军及 40 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43 军及亲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61 军置于文水地区；同时，组成“闪击兵团”，专门担任阻止我军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并配合各县保安团及警备大队，四出抓丁抢粮。一时之间，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即占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这位“土皇帝”的如意算盘是：抢粮、屯粮于手，巩固晋中，死保太原，熬到第 3 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军在中国登陆，便可趁机反攻，卷土重来，重温独霸山西的旧梦。

根据阎锡山的部署，我军在临汾战役之后，能否迅速北上晋中，歼敌保粮，彻底粉碎敌人的抢粮守城计划，就成了关系全山西解放进程的一着要棋。

北上晋中作战，我第 1 兵团面临 3 个困难。第一、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力强，占优势地位。第二，我军经过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相当疲劳。同时，部队新，干部缺额大，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也是明显的弱点。第三，平原地区，烧柴极缺。北上晋中作战，如出动部队、民工 10 万人，每日做饭烧水，至少需耗柴 30 万斤。平原不同于山区，老百姓烧柴困难得很，哪来如此多的柴禾供应我军！

党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第 1 兵团的实际困难，只要求第 1 兵团首先歼敌 1 至 2 个师。徐向前考虑再三，提出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

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歼敌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军实力，缩小敌占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的目的。整个战役的重心，要求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力争给敌以致命性的打击。各部队据此深入动员，积极进行思想上、战术上、物质上的准备。烧柴问题，由地方党动员和组织太行、太岳、吕梁山区的群众，筹集运输，以保证作战部队的需要。

战役发起的时间，预定为 6 月 20 日。

我军兵出晋中，与数量和装备均优势于己的敌军作战，必须以奇制胜。因而，在战役部署上，将吕梁、太岳部队放在西、南面，令其首先出动，迷惑和吸引敌人西向；而以主力 8 纵、13 纵，隐蔽开至太谷、祁县、介休、平遥南侧山区，乘虚突进汾河以东的平川地区，创造战场，机动歼敌。

6 月 11 日，我吕梁军区部队出现于汾阳、孝义以西之高阳镇地区。12 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县城。这一招果然灵得很，敌人乖乖听从徐司令员的指挥了。13 日，阎锡山派其 34 军军长高倬之率其“闪击集团”13 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向我高阳镇地区的吕梁部队分进向心合击，我吕梁部队则坚守牵制敌人。阎锡山又派其主力之一“亲训师”（即 72 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这样一来，阎锡山的 5 大主力师均被我军调动了：其中有第 40 师、第 46 师、第 71 师、第 72 师、第 13 师。

6 月 20 日下午，天气阴暗，下着蒙蒙细雨，部队向张兰镇方向开进，半夜天气变得更坏，风大雨急，战士们被雨淋得睁不开眼睛，什么目标也看不

清楚。加上天黑路滑，在泥泞中进军十分困难。6 月 21 日凌晨，虽然风停的住，但大雾弥漫，低空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楚，战士们怕掉队，只好互相扯着背包绳子前进。

当我 8 纵队的后卫 24 旅 71 团穿过大堡、曹村时，大雾才逐渐消散。就在这时，行进在大堡村中的 71 团 1 营，突然听到铁路上、公路上人声嘈杂，还有马叫和车轮滚动的响声。搜索的结果，发现高出地面的铁路基上有队伍和我军平行，铁路左边有行动的马队，人头黑压压一片。1 营李营长接到报告后，立即亲自前去察看，发现敌人四五路纵队并排前进，目标很大，似乎还没有看见在村落里前进的我军。

从行军态势上看，这股不明番号的队伍，肯定不是我军的兄弟部队，是不是敌军又往这里冒出来了？李营长当机立断，对不期遭遇的敌人，只能先敌开火抢占铁路高地，不管敌人多少，先把它冲乱，为前面纵队争取先机之利，保证后背的安全。于是他立即命令 1 连上刺刀向铁路上冲锋，把全营的轻重机枪，小炮集中起来，进行火力掩护。

在该营占领铁路基制高点后，71 团团长北沙立即率其 2、3 营，就地放下背包赶到现地投入战斗。

顿时，敌人大乱，数千敌人挤在不到 5 华里的麦地里。西边是汾河，不能徒涉，也不是渡口，正面已被堵住。被我占领的铁路敌人反复争夺不下来，正在运动的 24 门山炮也被冲垮了，不能占领阵地进行射击。

我 71 团的 3 个营在北沙团长指挥下把敌人分割成豆腐块，乘敌人队形混乱之际架起轻重机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去，手榴弹山像雨点一样打在敌人的队伍中间，可是只听到爆炸声响，却看不见敌人倒下去。仔细看去才明白敌人不是没有被炸死，而是敌人太多，队形太密，挤成了一个圪塔，倒下去的人留下的空隙很快就被活着的敌人填满了，尸体堆成了堆。

王新亭接到上述情况报告后，又立即命令 23、22 旅迅速展开，先后向敌人主动进攻。在大堡村西北方向 10 多里的曹村，我 23 旅 67 团依据曹村南侧，向大甫村方向出击；69 团从铁路东侧的桥头村杀出，沿铁路向西南发展；刚同三狼渡口跑步赶回来的 68 团，依托曹村东侧，由北向桥头村西南出击，该团 1 营则由曹村西北侧向曹家堡方向出击，控制汾河渡口，切断敌人向河西逃跑的退路。

我军各路出击部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原野上一片枪炮声、喊杀声。

两小时后，战场渐渐平静下来。代枪声而起的，是我军各单位收兵的联络号音。战士们押着成批的俘虏，背着成捆的枪支，牵着一匹匹驮着山炮的高头大马，各自寻找自己的单位。直到这时姚晓程才想到：打了半天，到底对手是谁，自己还未弄青。恰好 1 连在不远处集合，姚晓程便走了过去。

战士们正往一起集中俘虏，外号“铁头英雄”的 1 排长苏长永在查问 1 个敌军官。

“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

“72 师——‘亲训师’”。

苏长永大概没听懂俘虏那浓重的晋中口音，追问道：“什么‘青笋师’，倒是南瓜师。”

俘虏群里爆发一阵笑声。有人大胆地说：“官长，你听错了。是亲——训—一师。我们这个师是阎锡山亲自训练出来的。”

站在周围的我军战士，听了这话也禁不住笑起来。苏长永微微点了点头，

他压过了同志们的笑声，大声说：“不管你什么亲训师，在解放军面前都是青笋菜、豆腐渣！”

“亲训师”是阎军“闪击兵团”的主力，他们正是奉阎锡山命令从汾阳、孝义赶往平遥去的。想不到半路上碰到了我英雄的 8 纵部队。仅仅两个小时，阎锡山的这张王牌，外加什么“亲训炮团”，共 1.2 万多人，全部完蛋了。

首战就歼灭了阎锡山苦心经营、亲自培训、日本军官撑腰壮胆的所谓‘命根子”、“王牌”的王牌。大大的鼓舞了我军的杀敌信心和勇气，忘记了临汾战役后没有恢复过来的疲劳，并对晋中战役整个过程和兵团首长下决心提供了有利条件。8 纵参谋长张祖谅曾把这一初战胜利评价为“起了战役性作用”的一仗。

英勇无畏的麻连长

我 18 兵团在徐向前司令员的指挥下，于 1948 年 5 月下旬攻克临汾后，乘胜发起了晋中战役。

国民党阎锡山的嫡系——赵承绶集团和一个日本装甲兵总队（阎锡山为了维护他的地方统治，将日本投降后装甲兵部队组织起来，改编为第 10 总队，同我军作战），被我军紧紧包围在大常镇、小常镇一带的几个村庄里。此时，敌人已成瓮中之鳖，被围歼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

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 111 团 1 营营长肖朝群带着几个通信员到团部接受任务：大常镇的敌人被我们包围后，正处于惊恐动摇之中，有情况表明，敌人企图向太原方向逃窜。上级已定下决心，要全部歼灭，不放走一个敌人。要在明天拂晓前攻占大常镇外沿，打开口子，夺取一块前进阵地，巩固突破口，并坚持到明天晚上，为我大部队展开创造条件。肖营长立即回驻地部署。

担任突击任务的 1 连首先行动。连长麻志高带领全连，沿着一条干涸的水渠，成一路纵队迅速隐蔽前进。接近镇边时被敌哨兵发现，麻连长一摆手，几个战士猛扑上去，敌哨兵吓呆了。我 1 连乘机而入，迅速占领了大常镇边沿上的一排矮房子。我们好像天兵天将突然降临，镇里的敌人慌乱了。人叫声、马嘶声乱成一团，到处“砰砰啪啪”乱放枪，活像 1 窝捅乱的马蜂。

乘敌人混乱之机，麻连长命令部队迅速歼灭散乱之敌，控制制高点，抢修工事，巩固阵地。

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肖营长来到 1 连阵地前沿，纵目眺望，只见大常镇纵横数里，几千户人家摆得满满当当，街道房屋，栉次鳞比，大街小巷，错综杂处。镇子里，一片乌烟瘴气，挨家挨户，塞满了敌人；房上房下，明暗火力点纵横交错，敌人构筑大量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阵地上，麻连长两眼虎视耽耽地怒视着敌人。

肖营长凑近麻连长身旁说：“你们是插进敌人胸膛的一把尖刀，刚刚接触到了敌人的痛处，敌人还会进行反扑，必定会有一场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肉搏战。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决守住阵地，等待大部队到来。”

上午 10 时，敌人开始疯狂反扑。刹那间，机枪、炮弹像雨点般的倾泻到我军阵地上。连续爆炸声，此起彼伏；掀起的尘土、石块到处乱飞，阵地上，硝烟弥漫。

敌人的炮击刚停，大股的敌人乘着烟雾“呜呀哇啦”吼叫着冲过来。眼

看敌人越逼越近，完全进入我射击火网内。

只见麻连长手臂一挥，高喊：“打！给我狠狠地打！”

阵地上轻、重机枪一起开火，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里开花。一时疯狂的敌人被打得无处藏身，丢下几十具死尸，狼狈逃窜。

远处，靠近大路旁的打禾场上，堆得高高的麦秆也被打燃了，熊熊的烈火，映红了半个天空。倒在麦秆垛旁的敌死尸，被烧得焦黑焦黑的，散发出臭气。

麻连长见出击时机已到，用手枪把帽沿往上一顶，大声吼道：“同志们！冲啊！”

全连战士像猛虎一样跃出工事，扑向敌人。

阵地上到处都是吼声：“冲啊！杀啊！抓活的……、缴枪不杀！”

麻连长冲在最前面，以勇猛的动作逼近敌人。只见他掏出手榴弹投向迎面扑来的敌群，一颗又一颗，连续的手榴弹爆炸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应声倒下。没死的敌人吓得抱头鼠窜。

不多一会，敌人又向我发起第二次反扑。

这一次，敌人来得更凶狠、狡猾。他们先以猛烈的炮火向我轰击；然后，乘烟幕以散兵队形沿正面展开向我发起冲锋。我们对付敌人还是老办法：放近打！

敌人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在同我们正面交战时，以另一部兵力从 1 连侧翼偷袭过来。

30 公尺、20 公尺、10 公尺……，敌人轻手轻脚偷袭过来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麻连长忽然发觉右侧矮墙边“咕咚”一声响。他猛侧转头看，只见一个翻墙的敌人跌倒在地上，紧接着又有十几个敌人翻过来。麻连长猛一惊，顺手一枪， 撩倒了前面的敌人，同时大声喊着“敌人上来了！”随即一跃而起冲向敌人。

听见连长的喊声，部分战士迅速扑上去，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顷刻，在一块弹丸之地上，几十个人刀枪相击，拳脚横飞，战士们大喊“杀”声，从精神上完全压倒了敌人。

麻连长在同敌人撕打中，耳朵被敌人紧紧咬住，他忍着疼痛猛力一摆头，挣出右手，对准敌人的脑门心，狠命一拳，顿时，敌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白眼直翻，卟嗵一声倒在地上。麻连长猛地站起来，一脚踏在敌人的身上，顺手抓起地上的一支带刺刀的步阶，就势一刺刀，将敌人捅死。刚回转身迈出腿，冷不防被横在地上的敌尸绊倒了，正当爬起时，迎面扑来一个端着刺刀的敌人，麻连长急中生智，就地滚倒在敌死尸旁，随手抓起敌死尸的一只鞋，猛力向敌人打去，正好打在敌人的眼上。当敌人甩手捂住眼时，麻连长一个鹞子翻身猛然站起，一刺刀把这个敌人捅翻了。

这时，连队的战士们都过来增援，一面呐喊，一面以火力杀伤敌人。

阵地上，枪声、吼声融成一片，敌人溃逃了，突破口堵住了。

打退了敌人第二次进攻，更鼓舞了全连的士气，战士们发出钢铁誓言：坚决守住阵地，一定全歼强敌。

黄昏时，团首长作了新的战斗部署：1 营立即攻占前面那座高搂，为我大部队发起总攻扫清前进中的障碍。

敌人占据的这座高搂，就像老虎的血盆大口露出的大牙，挡住我军前进的道路。高楼上，布置了很强的火力，居高临下，四面八方都严密控制着我

军冲击的道路，如果不拔掉它，就会给我冲击部队带来重大伤亡，战斗就不能向纵深发展。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师首长给 1 营增加了 1 个重追击炮连，直接参加战斗。

1 营的几位领导感到，团首长把这个虎口拔牙的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给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信任和鼓励。这是关系到攻破敌人设防的全局问题。拿下这座高楼，就会震撼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营决定：这个任务，交给麻志高这个连去完成。

冲击前，我炮兵进行了充分的炮火准备。顷刻，敌阵地上浓烟滚滚，什么也看不清……

趁着烟幕，麻连长带领全连战士，迅速通过一条壕沟，钻进了高楼附近的一排矮房子里。这里和敌人只隔一条巷道，便于我爆破组隐蔽接近。

爆破组在麻连长指挥下，跃出矮房子。他们挟着几十公斤重的炸药，借着断继续续的闪光，匍匐前进。

子弹从头上“ 吱吱 ”飞过。他们一会儿卧倒，一会儿跃进，相互掩护，交替前进。

很快，接近了高楼墙边。这时，敌人好像发觉他们就坐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 升天 ”的危险，于是，一面鬼喊狂叫，一面疯狂射击。战士们选好爆破点，堆好炸药，敏捷地点燃导火索，然后，迅速地返回。

不一会，只听得“ 轰隆 ”的一声巨响，黑烟冲天而起，坚固的高楼墙壁，炸开了个很大的缺口。

麻连长带领战士们，箭一般地冲进去，房子硝烟弥漫，房柱东倒西歪，只听靠墙根的敌人被倒塌的墙壁，压得哭爹喊娘，楼房上的敌人，更是一团糟，我推你挤，争相逃命。楼梯上挤满了敌人，有的互相践踏，有的从楼上滚到楼下……冲进高楼的战士们，端起枪大声喝道：“ 缴枪不杀 !缴枪不杀！”

早吓得心惊肉跳，魂不附体的敌人，哪敢反抗，都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为了迅速扩张战果，麻志高带领全连追着敌人的屁股打，和敌人展开了夜战、巷战。窄窄的巷道，到处都有战士们搜索前进。激烈的夜战，打了整整一个晚上。

清晨，大常镇已被我军占领了一半，剩下的部分敌人，继续负隅顽抗，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中午，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

顿时，几十门大炮怒吼了，枪炮声、爆炸声，在大常镇北头翻腾起来，大地颤抖，烟柱冲天。

麻连长带领全连奉命向正街突击。

在我强大的炮火轰击下，被迫压缩在街上的敌人动摇了，此时，又见我突击连冲过来，赶紧举起了小白旗，一群群的出来缴械。由于俘虏太多，一时抽不出人押送，麻连长只好叫他们就地放下武器，朝着指定的方向自动下撤，由后面的收容队，把他们收容起来押送后方。

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被我军分割得七零八落，敌人想跑跑不了，想打也无法施展，等待着被我军一口一口的吃掉。

突击连，在麻志高的带领下，已接近到靠镇北敌人的一座大瓦屋下，这是一座青砖修筑独门进出、背后没有门窗的大瓦屋。麻志高仔细察看，发现

很多电话线都通向这里，为了判断这座大瓦屋的重要性，他靠墙，耳贴墙壁，只听屋里有乱糟糟的打电话的吼叫声，麻志高判断：这里是敌人的指挥所，必须立即炸掉。

麻连长心里盘算着，多用一点炸药，一次成功，让敌人好好坐一次“土飞机”！随即麻连长命令爆破组进行爆破，三个战士迅速将炸药包放好，并点燃导火索，药芯“嗤嗤”燃着，不一会，“轰隆”一声巨响，黑烟裹着石块冲天而起，大房被炸的歪歪斜斜，几根梁柱秃露着，碎砖块、瓦块散的满地都是……

趁着爆炸的烟雾，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冲进去，麻连长端着冲锋枪，看到左面一间房屋里的敌人乱哄哄的像老鼠似的乱窜，在右面墙角处，有一敌军官正威逼着部分敌人进行顽抗。突然，我一个战士中弹倒下，麻连长又恼又火，大声吼道：“还不投降，老子就不客气了”、“哒哒哒……”一梭子子弹射出去，打死了企图顽抗的敌人，那个敌军官还没有来得及还手，也被击毙了。解决了敌指挥所，麻志高带领全连继续向敌纵深发展。

在这座大瓦屋的对面是一条横街，俘虏供称：横街过去就是敌司令部。

敌人在通往司令部街道两旁较高的屋顶上，都筑有机枪工事。上面架有许多轻重机枪，封锁着每一条通道。

此时，肖营长命令麻连长：“交替掩护，冲进敌司令部，活捉赵承绶！”

麻连长接到命令，清点了一下人数，全连总共剩下七十个人，其中还有不少包扎着绷带的伤员。麻连长望着浴血奋战的勇士们，用他那嘶哑的嗓子大声说道：“同志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着把枪一挥向前冲去。

麻连长身先士卒，带领全连战士，在我机枪掩护下冲杀过去。战士们迅猛地冲过敌火网，有 8 个同志牺牲了。麻连长的头、手腕、右腿三处负伤，鲜血染红了包扎的绷带，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跨过横街，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战士们勇猛地冲进敌司令部院子里，高声喊着“缴枪不杀！举起手来！”

守在大院门口的敌人，吓得屁滚尿流，架好的机枪，还没来得及射击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敌司令部也被我占领了。

绥靖司令的狼狈相

1948 年 7 月初，我中原军区发起襄樊战役，把襄阳团团包围起来。

襄阳是敌人汉水防线的组成部分。敌第 15 绥靖区司令部就设在襄阳城内的杨家祠堂。绥靖司令、特务头子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为保住襄阳，在襄阳周围大小山梁构筑了工事和碉堡，摆开阵势，凭险阻击我军攻势。

中原军区 6 纵 17 旅参加了攻打襄阳的战斗。17 旅夺取了襄阳城西的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刀劈三关”后，兵临城下。

7 月 16 日凌晨三时许，攻城战斗开始，17 旅由 32 团为第一梯队，攻打襄阳城西门。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凭借着夜暗和浓雾的掩护，迅速运动到城下。突击部队冒着枪林弹雨，架设木梯，奋不顾身地登着木梯往上猛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西门城楼，很快歼灭了西门附近的守敌。城内其他地方枪炮声还很密集。这时李德生旅长、尤太忠副旅长和宗书阁参谋长已率第二梯队进入襄阳城内投入战斗，并在西街一所破瓦房内设立了指挥

所。

8 时左右。城上空有两架敌机在盘旋，不时用机枪扫射和投掷炸弹，妄图阻止我军进攻。但已无济于事。襄阳城里枪声逐渐稀疏，不久，我军就全歼了守敌。

我军已经捉到了不少俘虏，但却不见绥靖司令和副司令，李德生旅长向保卫科赵国锐科长指示：“襄阳城内的敌人，已于上午 9 时被我歼灭，但康泽和郭勋祺还没有抓到，根据掌握的情况判断，他们是跑不出去的，可能还躲在城内，我们的部队已开始在全城搜查。刚才纵队送来了一些国民党军官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康泽和郭勋祺的合影照片。还有一张是康泽的半身像片，你们仔细看看。”看完照片，李德生旅长指示立即在俘虏中，特别在军官中查找康、郭二人。尤副旅长还告诉，旅警卫连已在北门设了哨卡，盘查出城人员，收容散兵游勇，要赵科长带上人赶快过去。赵科长带人来到哨卡，一个多小时又登记了三百多个俘虏。

俘虏中有一个矮胖子，年约三十多岁，上身穿白衬衣，下着黄卡机军裤。他的长相和穿着，引起了赵科长的怀疑。当询问他时，他说话吱吱唔唔，开始说他是杨家祠堂做饭的，后来又说他是司令部的厨师，追问他康泽在那里，他说不知道。给他反复交待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之后，他才安静了些，说出了他是康泽的厨师。当夜里我军大炮开始轰击时，康泽和郭勋祺就叫做饭给他们吃，吃完饭他们就走了。去哪里不知道。听有人说，他们曾下令在城西南角城墙边挖过什么防空洞，后来又填了。

赵科长立即回到指挥所，向旅首长汇报这个重要的线索，首长令旅侦察队的一个排跟随赵科长到城西南角去搜查。

来到城西南角，没有发现防空洞，但见靠近城墙边有一大堆新鲜土。张排长领战士刨开土堆，立即露出国民党兵尸体，张排长令战士将四具尸体拖出，继续开挖，发现坑内有一个向下倾斜的地道，地道口用草堵塞着。将草搬去，里面还有四具蒋军士兵尸体。拖出尸体察看，地道通向深处，在另一岔道又出现一具尸体。一位侦察员去拉尸体，突然大声喊道：“排长，这是个活的！”

此人被抬出洞外，他穿着士兵衣服，头上脸上用纱布绷带包扎着，绷带上还有红汞、碘酒的迹印，露着两眼和嘴巴，他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看上去真是个重伤兵。

这时六纵队王近山司令员来到现场，叫来医生为这个人检查伤口换药。医生将其头部的绷带拆开，未见任何伤口。王司令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却是摇头不语。当一参谋插嘴说：“他就是康泽”时，他突然从担架上坐起，说他不是康泽。王司令员追问他是什么人，康泽在哪里时，他才招认他是郭勋祺，并不由自主地指了一下地道口。

张排长等三人再次进入地道，打着手电筒向地道深入搜查，发现地上铺着一条草席，别无他物，但揭开草席，露出一个长方形的土坑，坑内躺着一个头裹纱布绷带，穿着国民党士兵衣服，打扮和郭勋祺一样的人。当张排长用枪指着，命令他起来，如不起来就开枪时，他马上坐起来，要求别开枪。

张排长将此人押出地道，经过审问，他才供认他就是康泽。

战地记者姜树堂

有位老将军说：随军记者手里拿着的不仅是笔和照相机，也有枪，他们是用两种武器参加战斗的英勇战士！

姜树堂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青年军事记者。他原是新华社华东分社特约记者、华东野战军第 13 纵队《进军报》摄影记者，不幸于 1948 年 7 月兖州战役中光荣殉职，年仅 23 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那种热爱部队、热爱生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忘我工作和勇敢战斗的精神，使人永难忘怀。

姜树堂是山东省海阳县人，1925 年 10 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40 年秋他 15 岁时投考我党创办的胶东公学，194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酷爱摄影、绘画等艺术，在 1944 年 9 月于该校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胶东画报》社任编辑。后来，在他的请求下，奔赴前线，搞战地采访。他一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部队，既做宣传员，又当战斗员，备受指战员们欢迎。他到过的部队，领导常常用他的模范事迹来教育部队，激励战士们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夺取胜利。

1947 年秋，在艰苦的胶东保卫战开始后，姜树堂同志随 38 师 114 团作战地采访。为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这个团奉命参加奇袭被敌人一度侵占的掖县城。总攻一开始，他就背着照相机赶到第 1 营指挥所，扛起一箱子弹，跟随重机枪排去担负掩护攻城突击队的任务。这给正在准备攻城的突击队以很大鼓舞，战士们互相鼓励说：人家当记者的都这么勇敢，和咱们一起打仗，还给咱们照相，咱们可不能当孬种啊！

部队势如猛虎，一举登城成功，突击队向纵深发展。这时，只见一幢大瓦房，挡住了前进的道路，却不见这幢房子里有敌人抵抗的迹象。排长想带领战士冲进去，姜树堂不同意，他感到这其中可能有诈。于是，他自告奋勇地带领两名战士先摸上前去侦察。果然不出所料，发现三四十个敌人隐蔽在大瓦房顶上，企图居高临下地给我军以出其不意的火力杀伤。姜树堂当即和两个战士一齐开火射击，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纷纷从房顶上滚落下来，被我突击排全部歼灭。战后，部队为姜树堂请了功，纵队首长予以表彰。

不久，他又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围歼侵犯莱阳城之敌而进行的将军顶阻击战。他一面做火线鼓动，一面做战地摄影，拍下了我阻击部队坚守阵地、英勇杀敌的多幅照片，其中包括拼刺刀，进行肉搏战的珍贵历史镜头。据一位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英雄排长说：当时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残酷。一次，约 1 个连的敌人一窝蜂似地冲上来，我们的前沿阵地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人员也大部分伤亡，我身边只剩下三四个战士和七八个轻伤员了。这时，我发现姜记者还在战壕里照相，我让他快走，他不理，真使我又急又感动！心想：“人家记者是从上级来的，性命要比咱的宝贵，可他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怕死，咱还怕个啥？”于是，我觉得浑身是胆，喊了声：“同志们，跟我来，反冲锋！”连伤员在内，我们十几个人，立即投出一排手榴弹，乘胜跃出战壕，一齐高喊“杀”声，向敌人冲去。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一下子把敌人吓破了胆，后边的掉头跑，前边的跑不及，就被我们捅死了几个。当打退敌人这次进攻，我们撤回战壕时，见姜记者还端着照相机朝我们照，他高兴地说：“你们真勇敢，打得太好啦！”并告诉我：他刚才把我们和敌人拼刺刀的镜头也照下来了。

1948 年 6 月，姜树堂随军挺进津浦线，参加兖州战役采访，他跟随的是

一个主攻团——37 师 109 团，这个团担负着从兖州老西门突破登城的任务。

7 月 7 日，该团进入兖州城西关接替兄弟部队防务，直接作攻城准备。姜树堂首先随部队指挥员一起冒着冷枪冷炮，爬到护城河边，仔细观察了地形和敌情；然后从团部下到突击营——第 1 营进行采访。当时正是盛夏酷暑，掩蔽部里闷热又潮湿。为了活跃战地文化生活，他常常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口琴，吹奏给战士们听，并给尖刀班和爆破手画肖像，鼓励他们胜利完成战斗任务。

7 月 12 日黄昏，当部队向兖州城发起总攻时，姜树堂即跟随架设浮桥的第 3 连到达护城河边。河宽 10 米、深 2 米，加上敌人的火力封锁，使架桥十分艰难。第一组伤亡了，第二组接上来，又失败了。于是连长亲自带领第三组冲上去……前仆后继，气壮山河！看着这动人的战斗场景，营长田军突然想起记者的安全问题，便立即派通信员小王去找他回来。可是，当小王气喘吁吁地返回来时，却报告说：那个照相的姜记者坚决不肯回来，他一定要在河边照架桥。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了个钢盔扣在他头上……

入夜，架桥终于成功，姜树堂又随部队突击登城，现场拍摄突击队的战斗英姿。在突破口上，他还端起手枪，和战士们一起射击，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次日拂晓，城内的守敌垂死挣扎，集中炮火向老西门方向轰击。这时，姜树堂仍奋不顾身，冒着炮火拍照我后续部队源源攻入城内歼灭残敌的胜利场景，但本幸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噩耗传开，部队指战员无不十分悲痛！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为姜记者报仇！

兖州战役胜利结束后，13 纵队政治部为姜树堂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新华社华东分社发了专电，延安《解放日报》和山东《大众日报》也都发表了专文，悼念这位党的优秀新闻战士、人民的好记者。

半个窝窝头

1948 年 7 月初的豫东平原，夏日炎炎，热浪烤人，久旱无雨的天气使得河、井干涸，人们饮水都发生了困难，又缺少粮食。华东野战军第 6 纵队卫生部伤员转运队刚转运完杨拐攻坚战下来的伤员，又赶到赵村转运伤员。

这一带是新解放区，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赵村 200 多户人都跑光了，家家都是空空荡荡的，紧急转运伤员的民工担架队也无法组织，伤员转运队刚到，纵队的伤员就抬下火线了。人手缺，伤员的治疗转运工作特别紧张，一连干了 3 天 3 夜，直到 7 月 4 日中午，第一批 500 多伤员才紧急处理和转运完毕。

这时，大家才觉得又渴又饿，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一样，转运队的同志们从杨拐到赵村已经 4 昼夜水米未进了。指导员立即召集班长们开会，对大家讲明情况：部队现在远离老解放区，大兵团作战，各种物资供应都缺乏，特别是粮食困难，派人找了几天都未搞到一粒粮。现在队里仅存的一点干粮，只能给伤员先充饥。我们的口粮只有靠大家自己解决了，我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 金元券 ”发到各班，同志们要是能在老乡家或地里搞到吃的，就用“ 金元券 ”去买。

但大家都明白，夏收刚过，秋收未到，地里哪有粮食，这一带农村很穷，老乡走时又不明真象，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都带走或藏起来了，找到粮食的可

能性很小。

第二天天刚亮，转运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让立即向陇海路北侧转移。队里还有 10 名重伤员无法运走，只好先把他们转移到玉米地里隐蔽起来，并派人保护着他们，等着担架队来。

把伤员藏好后，派出去找粮食的一位叫黎洪的 16 岁的小战士回来了，他眼里透着兴奋向班长报告：“ 班长，我找到吃的啦！ ”说着小心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半个高粱面窝头。他告诉班长，窝头是从村东一户老乡家找到的，因为没有人，他把“ 金元券 ”搁在放窝头的簸箩里了。班长对他说：“ 只有半个窝头，你就吃了吧。 ”小战士不肯，坚持让大家都吃点。班长只好命令班里其余 4 个战士：“ 每人必须吃一口！ ”窝头在大家手里转了一圈，只吃了一半，小战士见班长没有吃，便把窝头拿到班长嘴边，非让班长咬一口不可，班长含着眼泪把窝头推给他，他不干，又递过来，班长接过来装做咬了一口，小战士以为班长也吃了，这才带着满脸的孩子气，高兴地说：“ 还有不少呢，那我就吃啦！ ”大家看着他一脸稚气，吃得那么香甜，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

就这样，全班同志靠着阶级兄弟团结友爱的精神力量，靠着这半个窝窝头，硬是又坚持了一天一夜，连续抢救了百余名伤员，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

虎啸泉城

1948 年 7、8 月间，敌人判断我有攻取济南或向徐州外围发起进攻的可能，遂一面加强济南及徐州的防守，一面将机动兵团集结于徐州周围。为了保卫济南，蒋介石以他的“ 名将 ”王耀武为司令官，指挥 11 万重兵，并在日伪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筑成了支撑点式的半永备型防御体系。外围防御地带分为警戒阵地和主阵地两层，基本防御地带由商埠阵地、外城阵地、内城核心阵地三线组成。

军委和毛泽东对攻济战役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这给粟裕以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了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以往，不论“ 攻城阻援 ”还是“ 围城打援 ”，都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这样，我军则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去争取前所未有的更大胜利。

粟裕决定将参战兵力 40%组成攻城集团，56%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 6 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 14 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兵力为 8 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 18 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9 月 10 日，许世友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次日，毛泽东发电给他：

“ 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

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许世友手拿电报，连连叫好：

“毛主席，英明，伟大，想得真周到，这济南，我是拿定了。”

1948 年 9 月 16 日，正当农历中秋节前夜。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在天空，为大地镀上了一层银色。高大的济南城墙，在月光下更显得陡峭森严。

24 时正，我各路攻城纵队随着许世友一声令下，炮火齐鸣，杀声震天，攻克济南的战斗打响了。

在战役发起之前，为了隐蔽战役意图，迷惑敌人，华东野战军在苏豫皖的各个纵队及苏北的兵力，推迟了北上打援、阻援的时间，与位于鲁西南的部队，布成夹击徐州的态势，并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袭扰徐州机场，破坏周围铁路。

这样就造成了敌人的错觉，我攻城兵力已包围济南时，敌人仍判断我方的意图在于围济打援，对济南可能长围久困，如东北战场对长春、沈阳所采取的战法，未必真攻。直至我军以突然勇猛动作，一举多路突破济南外围防线后，敌方如梦初醒。

我东、西线集团密切配合，从东、西两翼同时进击，像一把巨大的铁钳，把济南之敌紧紧钳住了。

攻击外城的战斗，于 22 日 18 时 30 分发起。

我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英勇战斗，外城守敌大部被歼。我各路突击部队刀锋所向，直逼内城。

王耀武自忖济南的命运如“风中之烛”，但又不甘心束手就歼，还想以内城这仅剩的一道防线，同我军作最后的较量。他判断我军连战疲惫，不经 3 至 5 天休整，根本组织不起来时内城的攻击；遂将整补后的第 15 旅、19 旅、57 旅及其他残部，重新部署，督令加修巷战工事，与我军决一死战。

在对情况的判断和对我军意图的猜测上，敌人又一次打错了算盘。正当他们调兵遣将之际，谭震林、许世友命令各部队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于 23 日晚直取内城。成百上千发炮弹，排山倒海似地落在了内城城垣上。

直到此时，济南守敌一等再等，望眼欲穿的所谓援兵，又在何处呢？

驻商邱、砀山的敌邱清泉兵团，察知迎面有华野强大的打援兵团严阵以待，侧翼有中原野战军集结牵制，胆战心怯，一步三顾，仅行至成武、曹县一带，离济南尚有数百公里之遥；而黄伯韬、李弥两个兵团，仍在所谓集结的幌子下，寸步未进。

济南王耀武盼援无望，蒋介石刻意经营的所谓“会战计划”，只得告吹。

攻取内城，对我参战部队是最严峻的考验。

各纵都在自己的进攻正面，英勇顽强，反复突击，给敌以大量杀伤。然而，始终未能打开突破口。

在此期间，蒋介石频频调动飞机，昼夜不停地对我军占领的商埠、外城等地狂轰滥炸。商埠西边一座大型油库被炸弹击中，烈焰喧嚣而起，火光把半个天空照得通明。敌机还扔下大量燃烧弹、照明弹，城里城外，如同白昼。我各路突击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之下。

夜深了，月光如水，繁星闪烁，黑虎泉水静静地、不停息地流淌着。内城城墙像一条黑色的巨蟒，依然亘卧蜷缩在那里。

攻城集团指挥所里雅雀无声。许世友盯着墙上的作战挂图，紧张地思考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激战关头的每一秒钟，对于指挥员都是极其宝贵的。失其一着，就会给整个战局带来莫大损失。

有人认为，参战部队鏖战 7 天 7 夜，未得到休整补充，有些部队建制打乱，伤亡大，缺员多，继续攻下去难以奏效。如果拖到天明，部队密集暴露于敌飞机轰炸和炮火压制之下，将会造成更大的被动。主张将攻城部队连夜撤出，进行休整，尔后重新组织攻击。

有人则主张坚决往里打。9 纵聂凤智表示，他们还有 5 个比较完整的团，部队已经做好再一次攻击的准备。

许世友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攻城的决心不可动摇。从战场的情形看，敌人的四道防线尽失，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内城之中，慌乱不堪，败局已定。如果我军撤下来休整，外国阵地得而复失，将前功尽弃。同时他还估计到，王耀武很有可能趁我部队后撤时来个反冲锋，使我军欲攻不克，欲撤不能，大大增加部队的伤亡。

许世友果断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打，不能撤！同时，从战役全局着眼，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中央军委曾来电指出徐州方向援敌有出动可能。速克济南，既能彻底打掉徐州之敌北援的企图，又能早日为我军南下作战开辟通道。”

谭震林完全同意许世友的意见。

于是，许、谭遂于深夜下达命令：全线再一次组织攻击、由东、西线集团两面对攻，一定要把内城拿下来。

24 日 1 时 30 分，各路突击部队像一把把永不卷刃的钢刀，直刺敌人的心脏。夜风一吹，蜡烛灯火随风摇曳着。兵团指挥所里静极了。突然，尖利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许世友一把抓过电话，原来是 9 纵报捷：

“25 师 73 团有两个营突进内城。”

“几点钟突破的？”

“2 时 25 分！”

拂晓前后，兵团指挥所更加忙碌起来，报捷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我军打进王耀武的“主席办公室”，在缴获的枪支中，有一支漂亮的银手枪，把上刻着“王耀武将军阁下，美军中将麦克鲁赠”，这是王耀武仓皇逃走时丢下的。据他的参谋长说，在 23 日晚上 12 时，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最凶时，他从这里跑到城东北角的地下室里去了。

原来，王耀武看到局势已经绝望，便化装逃出重围，但逃到寿光县，即被我地方武装查出捕获了。

济南战役，我军共歼敌 10.4 万余人（内含吴化文部起义 2 万余人）俘敌将级军官 23 名。济南解放之后，山东全境基本解放了。

鲜血染红的《炮兵部队建设计划》

“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这是中共中央为悼念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同志，发给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的唁电。唁电对朱瑞为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评价是决不过份的。朱瑞是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创建者之一。他是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兵学校的代校长。且不说朱瑞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诞生所付出的巨大辛劳，仅就他在牺牲时衣袋里装着《炮兵部队建设计划》一事，即可见他为我军炮兵的发展成长呕尽的心力。

是的，朱瑞作为一名炮兵的高级指挥员，临上战场时还随身带着起草中的炮兵部队建设计划，不正好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炮兵的建设吗！这份《炮兵部队建设计划》，是他用热血写成的啊！

1948 年 7 月，东北军区开始进行辽沈战役的发动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朱瑞留守后方主持工作，他坚决要求上前线，说：我是炮兵司令员，理应在前方指挥作战。并表示要在解放东北的最后决定性战役中，到前方总结炮兵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的作战经验。

9 月 12 日，东北解放军首先包围了义县。为打好这一仗，在炮兵进入阵地前，朱瑞亲自领着负责主攻的几个炮兵团长到前沿察看地形。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很近，他们的一切活动，敌方一目了然。他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尾随轰到哪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担心，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察看，边指点部署。直到察看完全部阵地，才回过头来有趣而又严肃地对一位团长说：“ 这些家伙也太猖狂了，你明天先拉两个连来，把那几门炮给我敲掉，先给他们个下马威！ ”

10 月 1 日上午，东北解放军发起总攻。朱瑞威严地通过电话朝信号兵和炮兵阵地发出命令：“ 打！ ”顿时，只见一串串红、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一团团猛烈的炮火震撼大地，各种口径的大炮发出雷鸣般的怒吼，炮弹啸叫着飞向目标，准确地轰响在敌人的炮楼、城墙和城门阵地上。顷刻之间，就把敌人的炮火轰哑了，城南门右侧的城墙被炸开一道 40 多米宽的口子。朱瑞见此情景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一会儿工夫，敌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阵地，全部土崩瓦解。

朱瑞是炮兵司令员，在打开缺口后，照常理他可以不去第一线了，前线指挥员也一再劝说，不许他前往，然而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为了及时了解和总结炮兵打开突破口的经验，朱瑞一再向前线指挥员恳切要求：“ 让我去看看吧！看看城墙有多厚？看看多少炮才能打透？看看这种城墙到底怎样打法更好？怎样做到既打击敌人，又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还说：“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 ”在得到前线指挥员的默许后，他高兴地同炮兵司令部的其他几位领导和参谋、通信员、电话兵等一起到前沿阵地察看。朱瑞打头，猫着腰一直往前赶去，他还不断提醒身后的战友们注意敌情，沿着他的脚印走，不要踩响地雷！但走着走着，敌人暗堡里的一挺机枪忽然又从城门旁边向他们猛烈地扫射过来，朱瑞立即下令卧倒！在他卧倒时，扭头发现身后一位战友所在地点的地势较高，眼看就有被机枪扫射到的危险，他马上伸手去拉这位战友靠到安全的位置上来。不料这一拉扯，他旁边的一个地雷受到触动而猛烈炸响。朱瑞顿时遍身鲜血淋淋，染红了身下一大片土地。他壮烈牺牲了！见此情景，战友们的心都碎了，一齐悲恸地痛哭起来！刚才被他救护的那位战友趴在司令员身上放声大哭，炮兵其他几位领导也一齐上前含泪呼唤。前线指挥员接到朱瑞司令员牺牲的电话报告后，个

个心痛欲裂、泣不成声，立即派出司令部的担架，把他的遗体抬回了指挥所，放在自己的身旁，一边抹泪守护着，一边指挥战斗。整个战场顿时燃起了更加勇猛的复仇怒火，全体参战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残敌，不到 6 个小时，就将守敌 1 万余人全部歼灭，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战斗刚刚结束，人们在清理朱司令员的遗物时，从他的贴身衣袋里，发现了一份浸透着鲜血的尚未写完的建设我军第一流炮兵部队的计划。看着这份鲜血浸染的《炮兵部队建设计划》，回想朱司令员出生入死，英勇作战和创建炮兵的光辉业绩，指战员们又一次洒下了沉痛的热泪。

朱瑞的壮烈牺牲，更加激发起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的斗志，誓以祖国的解放告慰朱瑞司令员的英灵。为纪念朱瑞，由朱瑞所组建创立的东北军区炮兵学校于 1948 年 11 月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辽沈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部队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 1948 年秋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已十分有利。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 430 万人减少为 365 万人，其中正规军 198 万人，用于第一线的 174 万人被分割在以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和徐州为中心的 5 个战场上，进行重点防御。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 120 万人发展到 280 万人，其中野战军 149 万人。国民党军虽然在装备和数量上占有暂时优势，但战斗力下降，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内部矛盾更加尖锐。人民解放军作战能力则有极大增强，军政素质更加提高，虽在兵力总数上少于国民党军，但战场机动作战的兵力则优于敌人。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东北战场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尤为有利。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经过 1947 年夏、秋、冬 3 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敌 38.8 万余人，扩大解放区 30.7 万平方公里。冬季攻势后，部队进行了扩充和休整，到 1948 年 8 月，已发展到 12 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1 个铁道纵队、15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共 54 个师 70 万人，另有地方部队 33 万人。各部队经过大练兵和新式整军运动，军事和政治素质大为提高。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所部，遭到人民解放军连续打击后，处境困难，4 个兵团 14 个军 44 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从共约 55 万人，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 3 个孤立地区。由于北宁铁路（今北京——沈阳）若干段及营口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匾乏。在战略指导上，蒋介石和卫立煌为保存实力，曾考虑放弃长春、沈阳，打通北宁铁路，将主力撤往锦州，以便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但又顾虑将会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未敢贸然决策，处于是撤是守举棋不定的状态。

以上情况表明，在全国 5 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根据东北国民党军有可能全部撤至关内的情况，致电东北野战军，准备在冬季攻势结束后，以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克锦州，将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之

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重申这一战略设想。而林彪却顾虑重重，徘徊于打长春或南下作战之间，到 7 月 20 日才初步确立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决心。

但到 8 月份，林彪仍以敌情严重、供应困难等原因，而未作出南下作战的部署。在毛泽东批评并纠正林彪长时间徘徊于打长春或南下作战之间的犹豫之后，9 月 3 日林彪才制定南下作战的大体部署。9 月 7 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东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告诫林彪：必须确立攻克锦（州）、榆（山海关）、唐（山）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必须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集团来援时敢于同其作战；必须据此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决心发起辽沈战役。战役于 9 月 12 日发起，到 11 月 2 日结束，分为 3 个阶段。

战役的第一步，是首先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关门打狗。尔后围困长春，迫其起义。9 月 12 日，东北野战军首先在北宁线发动攻势，至 29 日，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高桥、兴城等地。10 月 1 日攻克义县后，迅速包围锦州。至此，国民党军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陆上联系被切断，战略要地锦州成为一座孤城。

锦州是山海关内外陆上交通的咽喉。该市四周环山，南傍小凌河、女儿河，地势险要。守敌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的第 6 兵团部和第 93 军、新 8 军各两个师，新 6 军 1 个师及原属第 60 军的 1 个师，共计 6 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 10 万人。

东北野战军对北宁线的攻势展开后，蒋介石深感不安，为解锦州之危，严令卫立煌由沈阳派兵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赴沈阳督战。30 日蒋介石飞抵北平，10 月 2 日又抵沈阳亲自指挥，确定从关内急调 11 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葫芦岛、锦西增援锦州；以沈阳地区第 9 兵团等部共 11 个师另 3 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先向彰武及以南新立屯攻击，企图截断东北野战军的后方补给线，然后经阜新趋义县，协同“东进兵团”对进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进行夹击。

10 月 2 日清晨，载着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列车，到达彰武车站，空中出现敌机，所有人员下车隐蔽待命。正在此时，林彪接到葫芦岛蒋军增加 4 个师的情报，又一次动摇了打锦州的决心。他不同任何人商量，便于当晚 22 时，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提出锦州如能迅速攻下，仍以攻锦为好；但强调长春比锦州好打，想回师打长春。要军委考虑。

10 月 3 日早晨，罗荣桓从刘亚楼口中得知此事，又气又急，立刻拉着刘亚楼到林彪住处。

“林总给军委发电，考虑回师打长春？”罗荣桓克制激动，问道。

“是的，”一贯独断专行的林彪，不觉得自己有错。“关内敌人增派 4 个师海运葫芦岛。葫芦岛有 10 万援军，锦州城里 8 个师敌人，工事坚固，不是短时间能拿下的，援兵不一定堵得住，我们会陷于被动，不如回师打长春。”

“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义县刚打下，锦州外围敌人肃清了，部队情绪很高，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么想？”罗荣桓严肃地问。“打锦州的作战方针，是经军委和毛主席批准的，怎么可以随便变更？”

“我是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请军委考虑指示嘛！”林彪说。

“电报中强调打锦州困难，强调打长春有利，显然想回师打长春，我看

军委不会同意。”罗荣桓肯定地说。

林彪坐不住了，站起来踱着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看法，还是打锦州好。”刘亚楼回答。

林彪不吭气了，坐在那里一个劲地吃炒黄豆。

罗荣桓想了一下说到：“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表个态，说明仍然按军委指示办，打锦州。”

罗荣桓看林彪没有表示不同意，便亲自拟好电稿。林彪过目时，把“前电作废”和检讨词句删掉后签发。

此电发出不久，即收到由毛泽东拟稿连续两封电报，批评回师长春的错误想法，分析打锦州的有利条件，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只要打下锦州，便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

刘亚楼看了军委来电后说：“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幸亏又发了电报。”

在收到林罗刘关于坚持打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及时回电，表示“甚好，甚慰”。

“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有都没有了。”

由于罗荣桓的及时劝阻和军委的批评，林彪坚定了打锦州的信心。根据锦州守敌防御部署和锦州地形条件，10 月 4 日晚，确定攻锦部队编成 3 个突击集团，以第 2、第 3 纵队及第 17 师、炮纵主力附坦克 15 辆为北突击集团，由城北和西北并肩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以第 7、第 9 纵队附炮纵一部为南突击集团，第 8 纵队附第 1 纵队炮兵为东突击集团，分别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实施辅助突击。

10 月 9 日，东北野战军攻锦部队在东西两翼阻援部队的保障下发起锦州战役。此时，在长春的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一张军事地图上，把眼睛死死盯着锦州，密切注视着锦州的事态。他知道锦州是整个东北的咽喉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锦州一旦失守，长春便危在旦夕。

东北野战军在夺取外围阵地后，14 日 10 时，各突击集团向锦州城发起总攻，至 15 日 18 时，攻克锦州，全歼守军 10 万余人，内俘范汉杰以下近 9 万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上撤向关内的道路。与此同时，坚守塔山的阻援部队第 4 纵队在第 11 纵队和独立第 4、第 6 师的密切配合下，与敌“东进兵团”鏖战 6 昼夜，击退敌数十次冲击，歼其 6000 余人，守住了塔山阵地，保障了攻锦部队的侧后安全，为攻克锦州赢得了时间；第 5 纵队和第 6 纵队主力将敌“西进兵团”阻于彰武及新立屯以东一线。

锦州的攻克，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0 月 15 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向沈阳撤退。但由于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在锦州失守后，长春守军第 60 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起义，新 7 军军长李鸿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第 1 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投诚，长春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共歼敌第 6、第 1 两个兵团，连同地方部队等共 20 余万人，控制了战略要点锦州，为尔后全歼东北敌人创造了条件。

锦州城破、长春守军起义投诚后，给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

南京，总统府官邸。蒋介石焦急地等待着长春的消息。

“总座，长春有消息了！”机要员把刚译完的电报呈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接过电报一看，“娘希匹，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全跑向共军……”蒋介石骂完，呆若木鸡，他那拉长变型的驴脸，活像一座石雕的头像，呆板、发青、无神、苍白，脸上每一个斑点的颜色都加深了。

10 月 18 日，蒋介石偕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 3 次飞抵沈阳，部署总退却。他错误地判断东北野战军经 1 个月的连续作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休整才可能再次采取大的攻势行动，遂令“西进兵团”继续西进，企图在“东进兵团”策应下，重占锦州，然后掩护东北残存的国民党军经北宁线撤入关内。同时，又令第 52 军由辽阳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海上通路。蒋介石唯恐卫立煌不执行命令，又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改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指挥其撤退行动。

锦州攻克后，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于 10 月 17 日致电林彪、罗荣桓，指出：一是如廖耀湘部不敢继续向锦州前进，或停留原地或由彰武退回新民、沈阳固守时，我军即稍经休整，然后集中兵力求歼锦西、葫芦岛敌全部或大部，迫使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葫，然后将其歼灭；二是如廖耀湘部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即求歼敌于援锦途中。10 月 18 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获悉敌“西进兵团”一部已占新立屯并继续南进，判断沈阳之敌有可能经锦州实行总退却，即向中央军委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打大歼灭战，各个歼来总退却之敌。19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20 日，东北野战军首长作出举行辽西会战的部署，决心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西进兵团”。其部署是：锦州地区的第 2、第 3、第 7、第 8、第 9 纵队和第 1 纵队主力、第 6 纵队第 17 师及炮兵纵队立即隐蔽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从两侧迂回包围“西进兵团”；第 5 纵队由彰武西南移至阜新东北地区，第 6 纵队主力仍位于彰武东北地区，第 10 纵队和第 1 纵队第 3 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 1 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止“西进兵团”向西南前进，以争取时间待主力赶到予以围歼；第 4、第 11 纵队等部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东进兵团”；第 11 纵队一部和独立第 4、第 6 师向山海关方向佯攻。

10 月 21 日，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在空军掩护下，由新立屯向南攻击前进。23 日到达黑山、大虎山地区，遭到顽强阻击。26 日，东北野战军将其包围于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 120 平方公里地域内，激战至 28 日晨，全歼该敌兵团部及 5 个军部、12 个师（旅）共 10 万余人，俘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编第 6 军和第 40、第 71 军军长。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标志辽沈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同时，为防止沈阳国民党军经营口从海上撤逃，东北野战军即令 3 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与 5 个独立师构成对沈阳的四面包围；又令 3 个纵队南下直插营口，断敌海上退路。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见大势已去，遂将据守沈阳外围据点的两个师调进沈阳，加强城防。随后于 10 月 30 日把防守任务交给第 8 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他本人在当日匆忙乘飞机逃走。11 月 1 日，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市区国民党军发起总攻，2 日占领沈阳，歼来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及 1 个兵团部、2 个军部、6 个师、3 个骑兵旅、4 个守务总队等共 13.4 万人，俘周福成。同日，营口解放，歼敌 1.4 万余人，守敌第 52 军军部及第 25 师共 1 万余人乘船逃走。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部队经 52 天激战，在关内各战场人民解放军有力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和所属 4 个兵团部、11 个军部、33 个整师及地方保安团队共 47.2 万余人。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全境解放，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这对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生俘“剿总”司令

1948 年 9 月 12 日，伟大的辽沈战役打响了。到 29 日，东北解放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之敌分割包围。

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兵团司令廖耀湘，后则属意于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而把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

对此，卫立煌内心当然清楚明白。但是，只要范汉杰的东北“剿总”兵力不离东北，对东北战局就有利，卫立煌也就乐于接受。

辽沈战役开始后，蒋介石召卫立煌于 9 月 24 日到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立煌仍然不愿接受。最后，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第 49 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立煌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命令。

10 月 14 日清晨，我军总攻锦前的炮击开始了。我炮兵纵队集中 500 门大炮向城内各固定目标猛烈轰击，锦州城顿时陷于硝烟火海中，一座座碉堡被轰得粉碎。轰击了足足 1 个半小时后，炮声刚停，漫山遍野千百把冲锋号一齐吹响，山鸣谷应，向攻城部队发出了冲锋的命令。战士们哗地一声跃出交通壕，向突破口冲去。

再说敌锦州指挥官范汉杰，在解放军进行全面总攻击后，鉴于形势不利，难以维持下去。瘳、侯两兵团的援锦又无望，乃于 14 日下午 4 时许与参谋长李汝和到第 6 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指挥所与卢及第 93 军军长盛家兴、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开会研究。

此时的范汉杰，一扫昔日的威风，垂头丧气地分析形势说：

“侯境如、廖耀湘兵团毫无进展，分别被阻止于塔山和新立屯地区，共军现已集中全力来歼灭锦州守军，然后才去同侯、廖两兵团决战。而锦州守军连日战斗伤亡过大，市区又无坚固阵地可守，外援无望，只有待毙。”

说毕，范汉杰叹了一口气，又问道：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卢、盛等人一致主张当晚向锦西突围。即决定由李汝和、盛家兴、黄永安拟突围计划，并负责通知各部队，突围时归盛家兴指挥。

当日黄昏，敌人即按计划开始行动。范汉杰同卢浚泉、李汝和随带特务团一部，从兵团司令员北面坑道向东门移动。一离开司令部就为突入南市区的解放军所发觉，受到火力阻击，以致后续部队未能跟上。越过南山农场后，不断碰到解放军部队从东面多处渡过小凌河向西行动。这时卢浚泉、李汝和

分向西面寻我部队，已经散失。

范汉杰在松山东面山地南北找不着自己的部队。而此时附近村庄驻满了解放军，锦州市内彻夜火光冲天，爆炸声终夜不绝。范汉杰不得不在松山东面一间小小的窝棚内住下，准备昼伏夜行。到了 15 日，锦州已完全被解放军占领。

10 月 16 日上午，在锦州东南 20 多里的谷家窝棚东南面的小道上，走来了 4 个穿黑衣裳的中年人，三男一女。其中一个大高个儿，头戴烂毡帽，穿一条露棉花的破棉袄，一条很不合身的小棉裤，肩上披一条破麻袋，手里拿着一个萝卜在啃着。

这时，解放军某部处理俘虏的机关正驻扎在这个村子。工作人员马上盘问起这 4 个行迹可疑的人。那个女人说话是广东口音，屡次三番地抢着回话。另两个男的装成很累的样子，唉声叹气地摇着头。大高个儿说话声音很小，他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帐的，从沈阳逃难出来，准备回老家福建去。说着，此人不住地把破毡帽往下拉，遮住半个脸，以挡着人们的视线。

但是他的很不自然的装束和动作，两只白白的手和牙齿，以及纵然小声说话也能听得出来的广东口音，都给这位所谓“沈阳难民”的身份划下一个问号。

当盘问他们 4 人是什么关系时，大高个儿说不清道不明，停了一会儿才说：

“我没话可谈，你们枪毙我吧！”

我工作人员早就看出了破绽，立即将 4 人看押起来。在进行审讯时，大高个答话漏洞百出。女的乱说一通，另两个自供是“尉官司书”和“勤务兵”。大高个儿什么也不说。可是，当解放军的卫生员给他擦伤了的指头上药时，他却很认真地说：

“擦些酒精吧，恐怕会得破伤风。”

第二天早晨，那个自供是“尉官司书”的，对看守的战士说，他有一件要事需告诉审讯人员。当审讯人员接见他时，他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经过你们多次的解释俘虏政策，我还没说实话。我就是范汉杰的侍从副官，那大高个儿就是范汉杰。”

“范汉杰，广东人，42 岁，大高个子，脸黑秃头顶。”——这是我锦州前线部队记熟了的形象，他又怎能逃出人民的天罗地网！范汉杰自思身任方面军的指挥官，丧师失地，难逃蒋介石的所谓“革命连坐法”，而同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罪恶，被俘之后，绝无幸免之事，于是为求速死，乃承认了身份。

我军攻克锦州，范汉杰和边区副司令官兼辽西行署主任贺奎，第 6 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第 93 军军长盛家兴，师长景阳、李长雄、黄文徽等均被生俘。

插紧铁“门闩”

1948 年 9 月，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了。

战役发起之前，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先打锦州可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立即电示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切断华北敌军北上增援和东北敌军向关外逃窜的陆上通道，形成“关门打狗”全歼东北国民党军之势。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以 4 纵和 11 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 1、2、3、7、8、9 共 6 个纵队攻锦州，以 5、6、10、12 共 4 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 5 个独立师对付长春守敌。担任攻打锦州的 4 纵和 9 纵，在与兄弟纵队一举歼灭了昌黎、北戴河、绥中、沙后所敌人之后，以迅速隐蔽的行动，突然插到锦州、义县之间，把锦北重镇义县严密包围起来。就在全体指战员眼睛盯着锦州城，攻城呼声正高时，东北野战军电令：立即回师塔山、高桥地区，与 11 纵及独立 4、6 师统归第 2 兵团指挥，阻击锦西、葫芦岛援救之敌。

我东北野战军完成围剿部署之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深感毛泽东这一着棋的厉害。于是火速飞奔于沈阳、葫芦岛、天津北平之间，频频调兵遣将。命令沈阳守军廖耀湘西进兵团出辽西，又令华北和山东抽调 7 个师海运葫芦岛，会同锦西原有的 4 个师东进兵团北上，企图解锦州之围。锦（西）、葫之敌，要增援锦州，必须夺取塔山，否则就不能解锦州之围。

为什么说呢？这是由塔山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决定的。

塔山堡是辽东湾上一个住有 200 户人家的村庄，位于锦州与锦西之间，东临渤海，西接白台山、虹螺山，紧贴锦西高地，两锦公路穿村而过，北宁铁路于村东一公里处与公路平行北上，是锦、葫敌人北进的唯一通道。村前横着一条 20 米宽的饮马河，开阔的河床上铺满了碗口大的鹅卵石，是个阻击敌人的天然屏障；民宅可作依托，既可与敌人展开巷战，又能得到村民支援，随时可得到粮水供应。

我军的防线就是以塔山堡为中心，东至海边，西至白台山、北山。如果将整个防线比作一座大门的话，那么塔山堡就是这座大门的“门闩”。因此，要想把援兵堵在门外，不仅要把“门闩”插上，而且一定要插紧。否则，塔山堡失守，两侧的白台山、铁路桥头堡等阻击阵地再牢固，也将无济于事。可见，塔山堡之重要对于整个阻击任务的完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塔山堡距锦州外围不到 20 公里，南距锦西之敌前沿阵地不足一、二公里，敌人占据的塔山南面的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我军阵地全在敌炮火射程之内，极易被敌控制，更何况，我军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陆、海、空联合进攻，兵力上是敌重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势上敌高我低，敌有坚固工事依托，这一切都预示着这个“门闩”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牢牢地钉住不能有半点松动，否则，必将影响整个东北的战略部署。

鉴于敌我双方态势，东北野战军明确指示：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线，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让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连续 6 天 6 夜动用了陆、海、空军，进行狂轰滥炸，组织成团成营的兵力轮番进攻。

在这血与火的拼杀中，人民解放军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少战士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身中数弹仍然与敌人拼杀；有的战士腰折骨断、双目失明、耳聋口哑，仍在投弹、装子弹、喊口号，坚守阵地。嵌有“守如泰山”四个大字的红旗，虽然千疮百孔，但仍然与塔山堡这个防线大门上的“门闩”一样，紧紧地牢牢地插在那里，丝毫不

动。而正面进攻的敌军，连遭数日来的沉重打击，死伤惨重，却始终未能撞开塔山堡这个铁“门闩”。

历时 6 天 6 夜的塔山阻援战斗，以我军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

10 月 16 日，蒋介石坐飞机在塔山上空盘旋时哀叹道：没有料到 3 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下塔山。”

雄兵十万围长春

194B 年 10 月 19 日，东北重镇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市民和学生涌向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解放。

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例。它从 1948 年 5 月 23 日长春外围战斗结束，到 10 月 19 日长春解放，历时 5 个月。在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以及我军攻克锦州这一决定性胜利的影响下，长春守敌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诚。

但是，胜利来自不易。

长春外围战结束后，我 10 万大军兵临城下。10 万敌军成了瓮中之鳖。但“翁中捉鳖”并非易事。

长春城中之敌，西半部新 7 军，是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云南滇系的 60 军，虽到东北后屡屡受挫，士气不振，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由东北的地主武装、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

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也决不会立地成佛，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

我军采取的方针则是“久困长春、政治攻势、经济斗争”，迫敌就范。

围城之初，敌人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

不久，城内情报源源不断地送来：

蒋介石命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在洪熙街察看地形；敌人连续几夜演习夜行军、急行军；敌人每人发了 3 天军粮；敌军官家属集中于海上大楼；敌将走不动的马都杀掉……，这些重要情报说明敌人有突围的明显迹象。

10 月 7、8 两日，敌全副美械装备的 38 师向我独 7 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

但经我数次各个击破，敌进展甚慢，气势渐挫。

遭此迎头痛击后，长春守敌便缩了回去。突围计划遂成泡影。

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面斗争。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最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

实行经济封锁，是我军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

对于军队来说，历来是“兵马未至，粮草先行”。我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把 10 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 10 万敌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城内的守军绞尽了脑汁。

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都被抢走，老百姓留的种子粮也全被搜刮掉。许多房屋被拆得只剩四壁，房上的草被拉进城去喂马，木板木梁被拆去当柴烧。

后来，我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距敌越来越近。

敌人外出抢粮、拆房，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逐渐逼得敌人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

然而，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遭我炮火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的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回窜；有的被迫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粮食都落到我军阵地或封锁区内了。

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均成了我军的美味佳肴。

真得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

敌军方面，郑洞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空投指挥所，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统一分配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规定大部分供给新 7 军。

60 军当然不服，离心倾向日增。

由于国民党军官兵饥饿难忍，谁抢到谁就私留分吃，加深了国民党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械斗。

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

“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枪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

足见国民党军矛盾之尖锐。

8 月初，除新 7 军 38 师每周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60 军 182 师能用 1/3 高粱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 4 个正规师都发代粮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发的钱只够买一斤黄瓜，只能熬些菜汤喝。

这样，困守长春的敌军内部，除了共同面临的饥饿危机外，正规军中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广大受害市民与国民党军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

长春城，人心浮动，朝不保夕。

郑洞国惊呼：

“长春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长春成了一座死城。

敌人内外交困，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士气大跌，军心浮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在部队中迅速展开。

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智慧，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式。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经验少，单纯用嘴喊，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后来，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这种办法既安全，效果又好。部队还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上；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城内敌人纷纷投诚。从 6 月 25 日至 9 月底，我军共接收敌军投诚官兵 1.35 万余人。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 60 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60 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派有几位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工作，使他们受到革命的影响。

以孙公达为首的地下党组织，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扩大影响，发展了一批党员，为 60 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10 月 14 日，我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 31 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 10 万余众。

这种形势，也加速促成了 60 军的起义。

17 日午夜 12 时，按照预定计划，我接防部队悄然进城，60 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

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成了我们的天下。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军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

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

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 7 军却已土崩瓦解了。至 18 日，新 7 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

19 日上午 10 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

至此，长春市已基本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

为了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军发表郑“负伤被俘”的消息。

因此，双方商定 21 日晨 4 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

西柏坡的灯光

在滹沱河的北岸，有一片广阔的稻田。稻田北面，是一座长满古柏的柏树坡。坡前有个七、八十户的小村庄。这就是西柏坡。

村子东头，有几所普通的农家房屋，夜间屋子的窗口放射出明亮的灯光。灯光亮在这深夜的太行山中，分外光彩夺目。

这灯光，从 1948 年的 5 月，一直亮到 1949 年的 3 月，未曾熄过一夜。是谁家的灯光呢？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屋里的灯光！

岁月峥嵘，远处的人不知道党中央就住在这里。但是，西柏坡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清楚，在那灯光下，彻夜操劳的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伟大领袖毛主席、亿万人民心中无限爱戴的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革命前辈。他们在部署着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在决定着蒋家王朝的灭亡；在起草和研究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描绘新中国的蓝图……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毛主席经常工作一个通宵，凌晨五点左右睡觉，到 11 点起床，然后在中央政治局大院前面的苇塘边上散散步。吃过午饭，又进入工作，一直到次日的黎明。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有时他连这几个小时的觉都放弃了。前线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他一张一张仔细看过，一份一份考虑复电，发出指示。仅在辽

沈战役中，毛主席在西柏坡发往前线的电报指示即有 70 多封。全国有多少个战场，情况有多么复杂，都装在毛主席心中，他要统一安排，统一指挥，需要费多大的精力呀！

那个时候，中央机关有一个简陋的沙沙水小发电站，如果停了电，毛主席就点上带罩的煤油灯，继续工作。

8 月的天气，十分炎热，毛主席办公的这间屋，因是农家住房，只有前面一个窗子，屋里热得坐不住。毛主席便端着灯到门前那个磨盘上去办公。

8 月的天，说变就变。一天夜里，毛主席正伏在磨盘上聚精会神地起草文件，霎时浓云密布，大雨将临。警卫员前来帮他拾掇文件，毛主席才恍然知道天要下雨。

周副主席的工作，跟毛主席同样忙，这情况，顶数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了解的清楚。他们一天几次到周副主席办公室来，送电报，取文件，汇报战绩统计……。每次进来，都看到周副主席那么专心地埋头工作。看完电报，听完汇报，审查完各个战场的战绩统计和我军实力统计……又一份份分别批给新华社发表，某同志审阅，某单位办理，或送毛主席审阅，或向下传达指示……工作紧张，有条不紊。他从来不歇假，每天夜里都工作到凌晨才去睡觉，上午 9 点又准时起床，一天顶多休息 5 个小时。

深夜 12 点，送来夜餐，一碗米饭，一碗菜汤、一盘小菜，放在进门的小茶几上，经常需要警卫员几次提醒，不然，放凉了，他也顾不上吃。

在淮海战役决战的日子里，周副主席两个昼夜连续工作，仍然精力充沛，细致认真。有一次，军委作战室一位同志把一张战绩统计表送进来。周副主席接过去，看了一下便问：“这数字核对过了吗？”

“核对过了。”

“没发现错误？”

“没有。”

“那么，碾庄地区被我军歼灭的黄伯韬兵团中，为什么少了 1 个团？”

周副主席的记忆力真强！连这么一个数字他都记得那么准确！

工作太劳累了，一次开完一个重要会议，天就要亮了，作战部长坐在旁边打起呼略来。周副主席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诙谐地说：胖子，回去睡觉！周副主席却好像刚刚胜利结束了一个战斗似的那么兴奋，他没有回去睡觉，却又走进了办公室，打开了桌上小碟里放着的那盒万金油，用食指沾了一点，抹在两鬓和前额，搓了几下，又继续工作下去。

周围的同志都在想：如何才能减少一点周副主席的劳累呢？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个办法：建议周副主席改为夜晚睡觉，即使是只睡五个小时也好，因为夜晚比白天安静，或许休息的还好一点。他们联合起来，瞅了个机会，走进周副主席办公室。

同志们说：周副主席，我们向您提个意见。

周副主席放下了毛笔，微微一笑，好像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似的。说：好嘛，提吧！

同志们说：我们建议您夜里睡觉，白天工作。

周副主席反问：为什么呢？

同志们说：夜间安静，白天休息不好！

周副主席说：夜间安静，这倒不错。毛主席说，晚上安静，没人打扰，所以他才选在夜间工作。你们也发现夜间安静，让我在夜间睡觉，这不发生

了矛盾？

周副主席这么一说，大家想到了毛主席同样是通宵工作。原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这样安排，也正是为了“安静”！他们还想再强调一下理由，周副主席却接着说：我和主席同在夜里办公，毛主席有什么部署安排，在夜里搞好了，大家一上班，我便可以向同志们传达，这不正好衔接起来，有利于工作吗？

听了周副主席的话，大家心里想，周副主席跟毛主席的工作配合得多好啊！毛主席的部署常常要征求他的意见，主席起草的文件，他总是虚心地学习研究，尽一切可能给主席提供资料。送交主席的文稿，他都要亲自过目，纠正错处，尽量给主席减少麻烦。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怎能改变他这个工作时间呢！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窗前的灯光，就是这样彻夜不熄。闪闪的灯光，照亮了柏坡岭，照亮了太行山，照亮了祖国的万水千山。

一顿只吃一个菜

全国解放战争的炮声打响以来，毛主席办公室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毛主席为了解放全中国日夜操劳，身边的工作人员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在伙食上，毛主席坚持每顿只吃一个菜，同志们多次提出要给毛主席提高伙食标准，毛主席都不答应。

为这事，食堂管理员很是着急，心想全国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全靠毛主席亲自指挥着解放战争来争取胜利，毛主席这样忘我地工作，周副主席多次指示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的身体，我这个当管理员的可得想方设法给毛主席改善伙食。

这天，天没亮管理员就起了床。他通知炊事员今天休息，整整个人卫生，由他来给毛主席做饭。管理员来到伙房里，把头一天买好的红辣椒、白豆腐、绿菠菜拿出来，一样一样洗得干干净净，准备给毛主席多炒两个菜。他拿起菜刀有节奏地切起菜来，但是他一边切一边又觉得有点为难，手里的菜刀越切越慢，一会儿不知不觉停住了。他转身蹲在灶边，看着炉膛里跳动的火苗……突然，他大手一拍，站了起来，抬脚就要往外走。这当儿，毛主席的警卫员小马到伙房打水来了。

管理员把小马拉到屋里，问：今夜，毛主席又是通宵工作？

小马点了点头：每天都这样。

管理员说：小马，咱可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啊！毛主席工作越忙，咱越要注意毛主席的健康，越要保证毛主席吃好睡好休息好。

小马说：我们班为保证主席足够睡眠想了许多办法，你们在伙食上……

管理员说：我倒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接着，他凑到小马耳朵边上，小声地嘀咕起来。

小马听着听着，“噗哧”笑了，说：主席要是批评呢？

管理员说：要是批评，你就往我身上推；我呢，就往同志们身上推。其实，推不推也是那么回事。好，咱就这样说定啦！

小马还想说什么，管理员却等不得了。他见小马已灌满了开水，便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出了伙房。然后，赶紧把炉火捅得旺旺的，又转过身来继续切菜，等米饭蒸熟了，又忙刷净炒勺，熟练地炒起菜来。

一会儿，小马跑来端饭了，见管理员一共炒了三个菜：一个是辣椒炒豆腐，一个是菠菜拌粉丝，一个是肉炒小油菜。小马看看这盘菜，又瞧瞧那盘菜，乐得一下子抓住了管理员的手说：好，这三个菜都是毛主席平时最爱吃的菜啊！

管理员只是笑，不说话，目送着小马敏捷地把饭菜端走

小马把饭菜端走了，管理员的心却更悬起来了。他怕毛主席让小马把菜退回来，便顺着灶边，踱来踱去，不时地看看墙上的小闹钟，十分钟过去了，小马没回来，二十分钟过去了，小马还没回来，管理员的心渐渐地踏实了。他走到窗台，踮起脚跟儿看着毛主席的房间，心想：以后呀，告诉炊事员，就用这样的办法，得空就给毛主席改善改善伙食……管理员越想，心里越乐，他收拾了一下炉灶，叼上旱烟袋，笑模悠悠地到外边散步去了。

管理员转到了柏坡岭下，他看看柏坡岭上的柏树，仿佛在向他招手；他看看柏坡岭下的红杏，好像在向他微笑。他转了一会儿，估计毛主席已经吃过饭了，便慢慢走了回来，坐在外院的磨盘前刚要抽袋烟，只见小马端着碗筷从大门里走出来了。他一看没剩回菜来，乐得眯缝着双眼，迎上去，接碗筷：给我吧，给我吧，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我做菜，你端菜，虽说多费了一道手续，可毛主席总算把菜吃了。

小马一听把嘴一咧：啊！你还以为主席把菜吃了！你数数有几个盘子？

管理员低头一看，愣住了，忙问：怎么就一个盘子？

小马说：那两个菜还在桌上摆着呢，主席一口也没吃。

管理员听到这里，拉上小马就朝毛主席的房间走。

他们走进屋里，毛主席已经开会去了，只见桌上原封原样地放着那两个菜。

管理员问：毛主席说什么来？

小马说：主席见多了两个菜，就问我是不是来了客人，我说没来客人；又问我是不是今天大家都改善，我说不是；他说那为什么要多做两个菜，我只好说了实话——是管理员为了照顾您的身体，特意为您多做的。主席听后笑了。他说：我的身体很好，告诉管理员不要提高我的伙食标准。主席说，本应立即把多做的两个菜给伙房退回去，管理员和同志们准不满意，那就别退了。告诉管理员中午和晚上就不要做菜了，把两个菜热一热，一顿吃一个就行了。

小马说完，抬起头看着管理员，只见他神情那样激动，却不知说什么话好了……。

特殊的午餐

朱德总司令在西柏坡的时候，按照规定吃中灶，儿子朱琦在食堂吃大灶。平时他对子女要求非常的严格，绝不允许孩子去中灶吃一口饭菜。可是这天中午，总司令却把朱琦叫到跟前，同桌午餐。看到这一幕的人，个个心里都感到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让朱德总司令破了常规。

原来，今天朱琦从阜平县参加完土改工作后，回到了西柏坡。看到革命的胜利形势发展的这样快，风尘扑扑的朱琦见到爸爸后就兴奋地说：“爸爸，革命就要成功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咱以后再也用不着像以前那样吃苦受累了，等新中国成立后，我陪您进北京好好享享清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本来是朱琦憧憬着美好的新中国由感而发的一句话，却在朱总司令的心里掀起了波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这句话的味道品了又品，想到在目前胜利的形势下，有必要对一些革命队伍里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

这时，到了开午饭的时间，朱总司令想了想，温和地对朱琦说：“今天我破个例，你跟我一块吃吧。”

饭菜端上来了，朱琦一看，这饭菜既普通又特殊：小米粥、玉米面窝头、两盘素菜、两盘拌野菜。朱琦吃了一口野菜，嘴里立刻感到有一股淡淡的苦味，他皱着眉头，好奇地说：“爸爸，这野菜这么苦，您怎么还吃它呀？”

朱总司令听完，慈祥的脸上收起了笑容，深情地说：“经常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了。长征的路上，我们就是靠吃它走过来的，有许多优秀的红军战士就是因为连这样的野菜吃不上，倒在了长征途中。今天的胜利，也有野菜的一份功劳啊！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毛主席把去北京比做进京赶考，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够考及格呀！”

总司令说到这里深深地看了朱琦一眼，接着说：“我们的毛主席最近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该怎么办，要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想想。”

朱总司令的谆谆教导，对朱琦的振动很大，他领会了爸爸的用意，一声不吭地把盘中的野菜吃光了。

饭后，朱琦望着一身朴实的爸爸，眼里含着泪花说：“爸爸，您的话我记住了，请您放心，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不跟您进北京了。”

听了朱琦的话，朱总司令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久，朱琦听从组织分配到火车机务段当练习生，当司炉，由于他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很快便当上了火车司机，驾驶着人民的列车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

播种

朱总司令在西柏坡的时候，非常关心群众的生产。常在休息时间，到田间和老乡一边劳动一边谈心。乡亲们见总司令平易近人、劳动朴素，就编了一首歌谣：

总司令，人人尊，既是官来又似民。

日夜用兵打江山，家里地里也操心。

说“家里地里也操心”，这话真不虚传。1948 年的 4 月，西柏坡一带正是播种的季节。家住滹沱河畔的老贫农刘永久和儿子去播种，老远就看见有两个人在他的田地里拔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走近一看，哟！是总司令。他看着总司令，非常激动地说：总司令，您……

总司令手里拿着拔的草说：种地要细心，地里不能见草，有草苗就长不好。少打了粮食，是大家的损失。

永久刚要插耧开耩，总司令走过来说：来，我拉耧！

永久忙说：总司令，您只要把敌人打倒，把生产领导好就行了，可不能

让您拉耧！

总司令爽朗地笑起来，风趣地说：刘老兄，你让我领导好生产，又不让我参加生产，那怎么能领导好呀？

永久一时无话可答，忽然见道上走来一个土改工作团的同志，就赶忙向他救援，希望他劝劝总司令，不要拉耧。那位同志和朱总司令对望了一下，彼此会心地笑笑，就对永久说：老刘，你让他拉吧！这没什么，在延安的时候，我们搞大生产运动，总司令和战士们一样的开荒种地。

永久虽然嘴里没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像滹沱河水一样上下翻腾——他活了几十年，清朝官吏、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都见过，芝麻粒大的小官就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还从来没见过像这样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还下田干活。他越想越不安：让总司令拉耧吧，心里过不去；不让拉吧，又推辞不了……

总司令把套绳搭在了肩上说：来，试试嘛！

永久说：要不这样吧，让俺孩子给你拉帮套！

朱总司令说：不用，我们来。

这时工作团的同志和总司令的警卫员走过来，一边帮上了一个，播种开始了。

为了让总司令省些力气，永久把耧掌得稳稳的，摇得匀匀的，并且暗自用力向前推着。总司令叠肘抱肩，身子微向前倾，迈着拉耧特有的步子，地头地脑有紧有慢，或挺胸或弯腰，都干得恰到好处。哟，还真满带劲哩！永久的心里暗暗敬佩。

七、八趟过去了，永久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总司令虽然身体健康，但终究已是花甲年龄，特别是看到总司令灰色军装上渗出了汗印，就更加心疼。心想，换他吧，他准不让；不换吧，这……永久可真费了心思。想了好一会儿，到底想出了一条妙计。

耩到地头上，他故意长出了一口气，装出疲惫的样子说：“可耩到头了，腰酸胳膊疼，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朱总司令擦一把汗，回头说：“还不到放歇的时候吧？！”

永久说：“到了，到了，我累得不行。”永久说着，先放开手，坐在道畔上。大家也都过来，一排溜地坐下。

永久挖一锅子烟，“巴哒巴哒”地抽着说：“总司令真是好样的，文武双全，样样在行。”

总司令诚挚地笑笑说：“不行啊，这么多年不常摸，都生疏了。”

永久见总司令这么和蔼可亲，心里的话就像开了闸门的水，滔滔不绝地往外涌：早就听说过总司令在井冈山挑粮的故事，俺还记得那几句——“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现在看来，耳听不如眼见……，嗨，没说的，真是“我们的好总司令”……说着，哈哈地笑起来，脸上流露出无限敬佩和热爱的表情。

总司令关切地看着永久说：“你累了，歇歇吧！我来扶耧。”

永久赶紧来劝阻：“不，不累……您……”

永久的儿子插嘴说：“我爹不真累，他是怕把总司令累着，才放歇的。”

永久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总司令说：“刘老兄，可不要这样，国家工作人员，不光要学会作工作，

还应该学会生产，革命就要胜利了，哪样不会也不行。再说，身体越锻炼越健康，决不会累坏的。”说着，起身抓住耧把：“来，接着干！”

大家知道拗不过，只得由他。总司令扶着耧，脚步稳健，手腕灵活，一步三摇，动作十分协调，耧眼漏籽匀，耩得垄直如线。

总司令播种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山乡。朱总司令勤劳的高贵品质，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播在了广大群众的心里。

行军鞋

金秋时节的河北大平原，稻谷泛黄，千里飘香。

一天，在这美丽的原野上，走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冀中军区实验剧院前线演出队。他们奉命从饶阳出发，一路歌声地直奔石家庄。步行军，对这些朝气蓬勃的队员来说，已经习惯了。艰苦的战争环境，不仅培养了他们坚强的意志，更使他们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魄和一双能走天涯海角的铁脚板。但唯一使他们感到苦恼的是长期的行军走路，鞋子磨损太快，总是不够穿，就连歌不离嘴的乐天派小花（她不姓花，因常演花木兰，大家都这样叫她）瞧着自己那露在鞋外的大脚趾，也无可奈何地叹起气来。

到了石家庄，经过一天的休整和准备。次日晚便在中山南路的一个戏院子里为部队首长和战士们进行了首场演出。第三天，大家正在做演出的准备，队长牛树清走了进来，严肃地对大家说：“首长通知，今晚停止演出。”

突然的变故，使队员们迷惑不解，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一阵刺耳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地传来，两架敌机呼啸着一闪而过，朝着昨晚演出的戏院子俯冲下去。瞬间，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远远望去，大院子笼罩在一片硝烟和火光中。

面对着疯狂的敌机，小花愤怒地说：“狗东西，你炸吧，解放了，我们正想拆了盖新的呢！”担任独唱演出的“金嗓子”也气愤地说：“等着吧。很快就会收拾你们这些强盗的。”

直到这个时候，大家心里才明白为什么首长让停止演出。

敌机发了一顿淫威，夹起尾巴溜走了。大家赶到遍地瓦砾的戏院子里收拾了一下未被炸毁烧坏的服装道具，便回到了住地。进门一看，屋里堆放了一大堆新鞋。

牛队长说：“同志们，这是首长派人送来的，每人一双，大号、中号、小号都有，你们自己挑吧。”

看到这千层底、实纳帮，既结实又大方的圆口布鞋，队员们欢呼着、跳跃着……。

这个说：“首长怎么知道咱们没鞋穿了？”

那个说：“肯定是看见小花的大脚趾露出来了呗。”

小花捧着一双新鞋激动的说：“首长真是雪中送炭啊！”

大家说着说着又不约而同地猜测起是哪个首长送的。小花说：“可能是分区的领导同志。”金嗓子满有把握地说：“我看肯定是军区司令员。”听到大家在那里乱猜，牛队长摆了摆手说：“你们别猜了，大家说得都不对，反正知道是首长送的就行了。现在我宣布：大家收拾一下行装，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进太行山。”

队员们一听，不觉都睁大了眼睛，性急的小花问：“队长，太行山大了，

到底去什么地方呀？”

老牛故意神秘地说：“是大家最想去的地方，你们猜猜看？”

“西柏坡！”大家一齐兴奋地说。

行进在层林尽染、风景如画的太行山里，同志们早已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一路欢歌笑语地来到了美丽的滹沱河边，来到了这片向往已久的革命热土上。

休整了两天，大家正准备演出的时候，牛队长又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演出队先上山下乡，为群众演出。”于是，演出队的全体队员们便沿着滹沱河向西走一路、演一路……。直到来年春天，才回到西柏坡为首长们演出。

演出是在一个打谷场上进行的，将就一个土台儿，四周围上几领苇席，台上拉一块幕布，上面挂几盏汽灯，演出的戏台就算完成了。

那天晚上，台前坐满了西柏坡及邻村的军民。演职员们正在台前、台后紧张地布置、化装。突然，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小花从幕后伸出头来一看，激动地叫了起来：“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看咱们演出来了！”

队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激动不已，要不是队长提醒“注意纪律”，早就跑到台下了。

领袖们的出现，好像给队员们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大家人人都憋足了劲。特别是小花，把一个替父从军、驰骋疆场的花木兰演活了。

演出结束后，同志们被请到了中灶食堂用餐。刚坐好，周副主席就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他亲切地对大家说：“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有事啦。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说完便亲切地逐一和同志们握手。当握到队长老牛的时候，周副主席说：“牛树清同志，你好啊？”。牛队长很吃惊，那还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周副主席忙得很少看戏，只有一次看完戏接见演员时，一一都问了名字，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周副主席还记得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

周副主席坐下后，发现小花很胆怯地站在一边没有入席，便立即向她打招呼：“那位‘女将’到这里来坐嘛。”

小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坐在了周副主席身边。看到小花很拘谨，周副主席风趣地说：“怎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花将军，还怕吃饭呀？”

几句亲切的话语，使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小花感动的热泪盈眶，她仿佛感到像坐在慈祥的父亲身边那样随便、幸福。

周副主席边给大家夹菜，边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次上山下乡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战士们和群众的欢迎。革命的文艺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你们这条路走对了。”

大家都在注意听周副主席的讲话，小花却看见了周副主席脚上穿的一双圆口布鞋跟自己脚上穿的那双一种样式，她心里一动，难道是……，她想问周副主席，可又不愿打断周副主席的讲话，不问吧，又忍不住，试了几试也没说出口。

周副主席看到这个情景，瞅着小花问：“你有话要说吗？”

小花说：“我想问问您，去年秋天我们在石家庄领得鞋，是谁送给我们的？”

周副主席说：“噢，那鞋嘛，是毛主席让我发给你们的。”

大家一听，感到非常的吃惊，原来只知道是首长送的，都万万没有想到是毛主席、周副主席送的，无比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控制了，大家只是含着

热泪一个劲地鼓掌。

周副主席接着又说：“毛主席知道你们行军、演出很费鞋，让我饭后给你们每人再发一双。希望你们穿着这双鞋永远走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的文艺道路。”

几天以后，演出队的全体队员们，穿上了毛主席、周副主席送给大家的新鞋又出发了，迎着隆隆的炮声，奔向了前方，奔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将军的“固执”

说起“胡子将军”王震，在伟大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叱咤风云，领兵打仗机智灵活，令敌胆寒。可是，为了革命，表现在他身上的“固执”脾气，也为世人称道。这里，采拮王震将军的几个小故事，以饱读者。

故事一：“大胡子”的故事。1936 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克服千难万险，走出草地以后，张国焘公然违背党中央、毛主席继续挥师北上抗日的决定，擅自下令并带领红四方面军向洮河西岸退却，致使红二方面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为了尽快摆脱这种险恶处境，红二方面军决定立即朝陕甘边境转移，向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靠拢。这时，担任红二方面军的王震，因忧虑红军的安危，日夜操劳战事，再加上生活异常的艰苦，身子骨日渐消瘦，尤其是他的络腮胡子长得既密又长。同志们都劝他，抽空把胡子剃一剃，王震却十分坚决地回答：“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

故事二：还是“胡子”的故事。1946 年，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以分路突围的办法，主动地进行战略转移，粉碎了国民党 30 多万大军的围歼、追击和清剿，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效地配合了各解放区的斗争。王震率领的一部主力部队边走边战，直到进入人烟稀少的陕南山区时，敌人仍然前堵后追，部队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整个部队的安危全系于王震一身，他倾全部心血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周旋，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人一天天消瘦，胡子却一天天疯长。看着王震的胡子又长得很长了，同志们关切地提醒他胡子该剃了。王震的回答依然是那样的坚决：“不把部队带回延安，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

故事三：“棉袄”的故事。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彻底消灭仍然在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军，西北野战军及时发起冬季战役。在我西北野战军发动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胡宗南集团被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在一个秋风习习的深夜，警卫战士拿着一件崭新的棉袄轻轻地换下正在聚精会神拟制作战计划的王震身上披着的破棉袄。第二天清晨，熬了一个通宵的王震起身发现身上穿的不是自己那件破棉袄，立刻喊来警卫员，指着新棉袄问：“这是怎么回事？”警卫员一看王震瞪圆了双眼，赶忙解释：“现在部队都换装了，那件破棉袄补丁摞补丁、补丁的颜色又不一样，实在没法再穿了，我就给您领了一件。”“那就不能穿了？”王震很不满意，立即命令警卫员：“马上去给我换回来！”警卫员一看首长真的发了怒，赶紧跑去把那件破棉袄换了回来，交给王震。王震摸着破棉袄上的补丁，感慨地说：“别看我王胡子棉袄破，三五九旅南征过陕南时，我穿的就是这件破棉袄。胡宗南听说我穿得很破，像个马夫、伙夫，就下了一道命令，凡见到八路军的马夫、伙夫通通抓起来。当年胡宗

南几十万大军没有抓住我，现在该轮到我抓胡宗南了。不彻底消灭胡匪，我王胡子决不换新棉袄！”

淮海战役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北起山东临城、南抵淮河的广大地区内，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 1948 年秋季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特别是在东北战场上举行的第一个战略决战性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双方力量对此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 127 万人增至 300 余万人；国民党军则由 430 万人下降至 290 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占有优势。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南部战线，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深刻变化。华东野战军已发展到 15 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 36 万人，另有地方部队 30 余万人；中原野战军已发展到 7 个步兵纵队 15 万人，另有地方部队 20 余万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已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役上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华东、中原两解放区空前巩固，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秋粮获得丰收，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增强。

在国民党军方面，由白崇禧任总司令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辖第 3、第 12、第 14 兵团和第 5、第 13、第 16 绥靖区，共 35 万余人，大部分布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汉口）确山至汉口段和长江北岸宜昌至安庆段。由刘峙任总司令的徐州“剿匪”总司令部辖第 2、第 7、第 13、第 16 兵团和第 1、第 3、第 4、第 9、第 11、第 12 绥靖区，共 60 万人（连同后来从其他战场增援到淮海战场的黄维兵团等部为 80 万人），这是国民党军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战略集团。大部置予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以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必要时放弃徐州，依据淮河抗击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刘峙集团虽然装备优良，背靠南京、上海，交通方便，但其后方补给线脆弱，津浦路一旦被截断，就将陷于粮弹两缺的困境。

早在 1948 年 7 月间，中共中央军委曾提出“冬春夺取徐州”的设想。济南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于 9 月 24 日向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海州、连云港之敌，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次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复电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你们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即将自徐州调返新安镇地区的黄伯韬兵团为目标，然后再歼两淮和海州、连云港之敌，歼其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以利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 1 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敌第 7 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 2 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之敌；第 3 阶段在淮阴、淮安方向作战。为了达成第 1 阶段的作战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的兵力部署原则，即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阻击和援歼敌由徐州东援的第 2、第 13 两兵团。14 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攻克郑州，然后攻开封或

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钳制敌徐州“剿总”第 16、第 2、第 13 兵团和第 4 绥靖区部队，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以一部兵团在平汉铁路以西、以南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使之不能调兵东进徐州、蚌埠。

遵照中央军委上述指示，华东野战军迅速作出部署，决心以 7 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围歼新安镇地区的第 7 兵团；以 3 个纵队及 2 个独立旅歼灭位于邳县地区的第 13 兵团一部，阻击该兵团东援；以 3 个纵队直出徐州东北台儿庄、贾汪，促使第 3 绥靖区部队起义，尔后截断徐州以东陇海铁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

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也迅速作出部署，其主力于 10 月 22 日占领郑州，将逃敌万余人歼于郑州以北老鸦陈地区。24 日，开封守敌东撤，中原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在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陈毅率领下，乘势继续东进。11 月 1 日，中央军委根据粟裕的建议，决定整个战役由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

11 月 7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根据辽沈战役结束后出现的全国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决心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集中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共 60 余万人进行淮海决战，消灭刘峙集团，为渡江作战创造条件。遂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按原部署直出新安镇两侧及台儿庄、贾汪、邳县、炮车；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继续在徐州以西地区求歼第 4 绥靖区刘汝明部，尔后两大野战军直逼徐蚌线。并强调指示，第 1 仗应力争歼灭敌第 7 兵团全部、第 13 兵团一部和第 3、第 4 两个绥靖区的部队，第 2 仗求歼敌第 12、第 16 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最后将其全部歼灭于长江以北。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刘峙集团一部的战役企图，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按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战略部署，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决心发起淮海战役。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又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并决定，为统筹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临机处置一切。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开始，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结束。

根据中央军委的历次指示和当前情况，华东、中原野战军首长分别确定作战部署：华东野战军以第 1、第 6、第 9、鲁中南纵队和苏北兵团指挥的第 2、第 12 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 7 纵队附特种兵纵队主力，担任割裂、围歼位于新安镇、阿湖地区国民党军第 7 兵团的任务；以第 4、第 8、第 11 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围歼邳县、官湖、炮车、运河车站地区之国民党军第 13 兵团一部，控制运河以东阵地，阻击敌第 13 兵团东援；以第 7、第 10、第 13 纵队等，由山东兵团首长指挥，自临枣路以北地区直出临城、台儿庄、贾汪，争取敌第 3 绥靖区部队起义，尔后自徐州以北、以东进逼徐州，切断陇海铁路，占领有利阵地，阻击徐州之敌东援。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野战军第 1、第 3、第 4、第 9 纵队，以及进入鲁西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第 3、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 1、第 3 旅，求歼位于商丘地区的第 4 绥靖区部队，钳制敌第 4 兵团，然后以主力直出徐蚌线，切断徐蚌联系，以西面、南面威胁徐州，并阻击可能由蚌埠北援之敌；以刘伯承指挥的第 2、第 6 纵队和陕南军区第 12 旅等部侧击和尾击由确山东进的敌第 12 兵团，迟滞其前进。

11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主力按预定计划向新安镇地区国民党军第 7 兵团发起攻击。7 日，敌沿陇海路西撤，华东野战军查明敌动向，立即调整部署，展开猛烈追击、截击。8 日，国民党军第 3 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 2 个军 3 个半师共 2.3 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11 日，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第 7 兵团主力 4 个军 7 个师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 10 多个村落内，并在窑湾歼灭其担任翼侧掩护任务的第 63 军。12 日，华东野战军向敌第 7 兵团发起攻击，激战至 22 日，全歼敌第 7 兵团，击毙兵团司令官黄伯韬。在此期间，阻援部队对从徐州东援的国民党军 2 个兵团进行了顽强防御；中原野战军主力由郑州、开封东进，于 15 日攻占战略枢纽宿县，截断津浦路徐蚌段，阻止由蚌埠北援的国民党军 2 个兵团，并将由河南确山方向来援之第 12 兵团阻止在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国民党军 18 个师（内 3 个半师起义），并给敌第 2、第 13、第 16、第 8 兵团等以一定打击，控制了战略枢纽宿县，将刘峙集团分割为南北两大股，为全歼该集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围歼国民党军第 7 兵团之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设想下一个歼击目标，或诱歼由徐州东援之敌第 2、第 13 兵团，或歼击第 6、第 12 兵团。11 月 19 日，总前委常委研究战场情况后认为，华东野战军歼灭敌第 7 兵团后，已相当疲劳，如不休整，接着又打战斗力较强的敌第 2、第 13 两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以现有兵力阻击敌第 6、第 8 兵团和第 12 兵团两路援兵，也有较大困难。根据这一分析，遂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主力位于徐州以东、以南，一面监视徐州之敌，一面进行休整，同时以一部兵力协同中原野战军歼击敌第 6、第 12 兵团。

第 7 兵团被歼后，蒋介石急忙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商讨对策，决定猬集徐州的第 2、第 16 兵团向南，第 6、第 8 兵团由任桥、花庄集向北，第 12 兵团经南坪集向东北攻击前进，企图南北夹击，重占宿县，恢复津浦路徐蚌段，改变不利态势。11 月 23 日，敌第 6、第 8 兵团迟迟不进，第 12 兵团已进至南坪集，形成孤军冒进。

淮海前线指挥员当即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心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灭敌第 12 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固镇地区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敌第 6、第 8 兵团各一部。24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即敌第 12 兵团）。敌第 12 兵团，辖 4 个军 11 个师及 1 个快速纵队，约 12 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第 18 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该敌于 24 日上午强渡浍河，钻进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当发觉处境危险后，兵团司令黄维即令部队向浍河南岸收缩。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至 25 日晨，将敌第 12 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蒋介石得知第 12 兵团被围后，于 26 日命令该部应不顾一切以主力向东攻击，与李延年兵团会师。27 日，黄维依令以其主力 4 个师向东南方向突围，被击退。其第 85 军第 110 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乘机率部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 28 日改令第 12 兵团站稳脚跟，就地固守，并令杜聿明率 3 个兵团经永城、涡阳、蒙城，先解第 12 兵团之围，然后一起南撤。30 日晚，杜聿明集团 30 万人撤出徐州，沿萧县、永城公路仓皇西撤。

华东野战军查明徐州敌人动向后，以主力发起追击。至 12 月 4 日拂晓，将敌全部合围于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并于 6 日歼灭向西南突围的

敌第 16 兵团，仅兵团司令官孙元良率少数脱逃。至 10 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击退杜聿明集团多次突围行动。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一部对敌第 12 兵团展开猛烈攻击，至 12 月 15 日，将其 10 万余人全歼，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战役第二阶段，人民解放军解放战略要地徐州，歼灭国民党军精锐兵团之一的第 12 兵团和第 16 兵团，严密包围了敌第 2、第 13 兵团，并将敌第 6、第 8 兵团驱逐至淮河以南，从而为全歼杜聿明集团，争取淮海战役最后胜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当敌第 12 兵团即将被歼,杜聿明集团 2 个兵团 8 个军被合围在陈官庄地区，全军覆没已成定局时，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另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从 16 日起，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为配合正在进行的平津战役，对杜聿明集团余部围而不歼，转入战场休整。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反复广播毛泽东为淮海前线司令部撰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1949 年 1 月初，当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进行的平津战役，已给傅作义集团以沉重打击，其退路已被切断时，华东野战军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采取先歼包围圈东部的敌第 13 兵团，再歼西部的敌第 2 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其部署是：以第 3、第 10、第 4、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为东集团，向敌防御阵地的东部实施主要突击；以第 1、第 12、第 9 纵队为北集团，由北向南攻击；以第 8、第 2、第 11 纵队为南集团，由西南向东北攻击。另以第 6、第 7、第 13、鲁中南、两广纵队和由济南战役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 84 师改编的第 35 军等部为战役预备队。1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 3 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杜聿明第 2、第 13 兵团发起猛烈攻击。至 10 日下午 4 时全歼杜聿明集团，击毙敌第 2 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俘杜聿明，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战备过程中，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和冀鲁豫分局全力组织支前工作。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日夜活跃在战场上。523 万支前民工，由后方向前线运送弹药 730 万公斤、粮食 2.15 亿公斤，有力地保障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人民解放军在战场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5 个兵团部、22 个军部 56 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 55.5 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的第 5 军和第 18 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至此，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建议搞“合编”

1948 年 11 月 6 日晚，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 59 军和 77 军约 2 万余人，在中共秘密党员、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何基沣、张克侠的率领下，宣布起义，为淮海决战，加速围歼黄伯韬兵团起了重要的作用。起义部队撤出贾汪前线，开到山东兰陵整训。

这天，胶东军区东海分区司令员彭林（彭栋才），突然接到华东野战军首长命令，要他立即赶赴野战军总部，受领一项重要任务。原来，为了尽快将何基沣、张克侠将军带出来的起义部队改造过来，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华东野战军总部决定将这两个军的起义部队编成一个军，派彭林和北海军分区司令员邓龙翔带 300 余名干部前去执行这项艰巨的改造任务。

在华东野战军总部，组织部长胡立教向彭、林二人传达了上级指示和任务，并宣布了彭林任该军政治委员，邓龙翔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之后，胡立教部长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彭林曾多年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策反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对改造国民党官兵有一定的经验。他根据以往采用“派人去改造”困难比较大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大胆设想，即改用派部队同国民党起义部队合编的方式进行改造。他的理由是：第一，国民党军队内部历来帮派林立，几乎层层拉帮结伙，关系错综复杂。合编的本身就有利于迅速解决起义部队中的原有帮派体系，而仅派少数干部去做工作，则难以在短期内达到目的。第二，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军队中建有组织，安插了特务。要迅速清除这些特务组织，及时发现和逮捕反革命特务分子，实行合编是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光靠少数人做工作则要困难得多。第三，国民党军的官兵长期接受反共仇共的宣传教育，不少人都染有腐败的作风。实行合编，不仅有利于对起义官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而且还可通过起义官兵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学习、生活、操练，使他们在实际接触中受到感化和熏陶，加快树立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思想。第四，采用合编方式，能保持两个军的建制，有利于消除起义军官兵惧怕被吞并的疑惑心理，增强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信任。

听了彭林的精辟分析，胡立教部长感到他的这项建议符合国民党军队的特点，提得有理，提得及时。于是，立即向野战军首长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意见。野战军首长经过分析研究，同意了彭林提的建议，决定将部分地方主力部队分别与两个军的国民党起义部队进行合编，按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编为华东野战军第 33 军和 34 军。

实践证明，采用合编的办法，大大加快了对国民党起义官兵的改造过程。时隔不久，这两支新编的野战军，就以崭新的面貌加入到了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战斗行列。这一办法，在以后我党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中，作为一条经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广运用。

浴血三官庙

1948 年 11 月 8 日，我华野部队将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经过 10 余天的作战，黄伯韬兵团即将被我歼灭之际，蒋介石急令李延年、刘汝明、黄维 3 个兵团驰援徐州。黄维兵团共 12 万人，沿蒙城、宿县公路疾进，于 11 月 21 日突过涡河、淝河进展较快。遵照军委指示，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黄维兵团。我军 11 旅奉命由罗集地区星夜赶至宿县的南坪集阻击黄维兵团北进，为主力合围该敌争取时间。

南坪集位于偿河南岸蒙宿公路上，是黄维兵团北援徐州必经之地。其北侧浍河不易徒涉，只有南坪集一座坚固的公路石桥，重兵舍此不能通过。

我 31 团和 32 团 1 营重点扼守南坪集及其两侧阵地。32 团 3 营沿浍河北岸姚塘子、李家庄、三官庙直至东坪集 10 余里的地区占领阵地。保障南坪集的翼侧安全。32 团 2 营为旅的预备队。当时 11 旅只有 2 个团。32 团 3 营接受任务后，确定防御的重点是三官庙高地。因为三官庙是突出的一块高地。只要扼守住三官庙，敌人就是过了浍河，也无能为力。

11 月 23 日 7 时，黄维兵团先头部队与我南坪集防御部队的警戒部队打响，九时许，向我 31 团和 32 团 1 营的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敌人集中火力

和兵力用多半天的时间向我进攻，我阵地巍然迄立不动。这时，敌人发现 3 营的防线是薄弱环节，妄图转而从这里突破，迂回至南坪集防线的侧后。

敌人集中炮火向 3 营的阵地轰击，飞机轰炸扫射，但是重点是轰击三官庙阵地，其炮火特别集中。一个齐射就是几十发炮弹，10 连在三官庙的工事全部被摧毁，部队伤亡较大。全连干部只剩下 1 个负伤的排长和 1 个副排长了。敌人在炮火轰击的同时，其舟桥营在三官庙前边的浍河上开始架设浮桥。10 连的阵地由于敌人继续进行炮火轰击，阵地硝烟弥漫，视度不良，发扬火力受到一定限制。刘四维排长的重机枪排就布置在三官庙前边的浍河北沿，这时，主要依靠他们阻击敌人的架桥活动。他们充分发挥了重机枪的威力，敌人跳到河里架桥的人员连续几次被他们打垮，在岸上指挥的敌舟桥营营长也被他们击毙。这时敌人组织炮火和轻重机枪加以压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把浮桥架了起来，敌步兵蜂拥渡河。刘四维排继续阻击渡河的敌人，机枪打坏了，用手榴弹阻击敌人。最后，全排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战役结束后，刘四维同志被评为战斗英雄。

敌人一面继续渡河，一面很快组织了 1 个连的兵力向三官庙发起了进攻。10 连负伤的排长仓促组织了一部分同志进行阻击。敌人攻势迅猛，加之我们工事被炸坏，人员伤亡大，建制混乱，阻击不力。敌人很快就推进到三官庙前沿十几米处，双方用手榴弹激战。在这紧要关头，副排长张生福同志带领十几个人跃出工事，向敌人侧翼来了一个反冲击，才把敌人的进攻打下去。

敌人向三官庙进攻的同时，也向东西两翼采取攻势，特别是向西翼进攻较猛，因为西翼紧靠南坪集，便于迂回南坪集的侧后。营指挥所受威胁较大。营里一面组织通讯班、司号员、卫生员等积极阻击，一面急调 11 连 1 个排在西翼阻击，调 9 连 1 个排在东翼阻击。敌人第一次进攻受挫后，很快组织了第二次的进攻，第二次进攻的敌人是 1 个步兵营，采取以连为单位的轮番攻击。先进攻的 1 个连也是很快就推进到三官庙前沿十几米处，双方在相距十几米处用手榴弹激战，关键时刻，张生福同志带的十几个同志突然从侧翼向敌人实施反冲击，又把敌人的进攻打下去。但是，紧接着敌人又 1 个连攻上来。张生福同志的反冲击分队，无法及时撤回阵地，就在野战阵地上同敌人展开了激战，先射击、投弹，很快就拼开了刺刀，终因敌众我寡，全部壮烈牺牲。战役结束后，张生福同志被评为战斗英雄。紧接着敌人第 3 个连又发起了进攻，很快接近了三官庙阵地前沿。这时已负伤的文化教员接替了机枪射手，充分发挥了机枪的威力，无论扫射、点射，打得敌人无法抬头，这对打退敌人第三次进攻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文化教员是敌青年军 206 师解放过来的，他在敌人那边就是机枪射手，射击技术比较好。营里及时通报表扬了他，并给他记大功一次。

在敌人第二次向三官庙进攻的同时，为了减轻敌人对三官庙的压力，营部命 9 连的 1 个排和 11 连的 1 个排从东西两翼向敌人进攻。11 连的 1 个排由指导员李维政同志指挥，从西翼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曾经一度突破敌人的防线，并俘虏敌人 10 余名，起了重要的牵制作用。不幸的是，李维政同志在突破敌人防线时，英勇地牺牲了。9 连 1 个排在排长王在召同志指挥下，从东翼向敌人进攻。也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但是很快遭到敌人的反扑，在同反扑敌人的激战中，王在召同志也英勇地牺牲了。

敌人第三次进攻开始前，又对三官庙阵地进行了炮火轰击，约 10 余分钟

后，敌 1 个步兵连发起了进攻，为配合 10 连固守三官庙，几乎是敌人向三官庙发起进攻的同时，营里命 12 连从敌人的西侧展开了猛烈的攻势。12 连的进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人很快将进攻三官庙之部队撤回，由进攻转入了防御。这时已到 19 时左右，天已经黑下来，战斗暂停止。

敌人的这次进攻，损失惨重，特别是三官庙阵地前边，敌人的尸体已是堆集如山了。敌人被我歼灭估计有 600 余人。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伤亡 200 余人，特别是 10 连原来 200 余人的连队，只剩下 40 多人了。

晚上，团指挥所召集 3 营和 2 营的营干部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以 2、3 连的全部兵力于夜间将过河的敌人彻底歼灭，然后拆毁浮桥，便于明天的防守。会后，3 营正在召集各连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的时候，接到团指挥所的电话通知，根据中野首长的指示，为了便于中野其他纵队合围敌人，将敌人再往北放一放。于是团里原来的战斗布置撤销，部队经过充分的准备后撤往南坪集。

一次简明有力的战斗动员

1948 年隆冬，淮海战场上，雪花随着刺骨的寒风吹落在大地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奉上级命令和中原野战军一起参加围歼蒋介石黄维兵团的战斗。

12 月 12 日上午部队出征前，纵队司令员孙继先（红军抢渡大渡河 18 勇士的营长）在电话中布置任务，命令营长张明带领屡建战功的“洛阳营”担任主攻敌人野战工事的攻坚任务。接受任务后，张明对司令员讲：“战士们求战情绪可高啦！是不是请首长再来给大家讲讲？”孙司令员想了一下说：“不用专门讲了，等部队出发时，我在路旁等着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干部战士休息好，吃饱睡足。”

当天下午 3 点，孙司令员站在十字路口旁的雪地里等候参战部队过来，“洛阳营”通过时，孙司令员叫住张明说：“这次你们随刘邓部队参战，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只要你们做到：

第一，你们是为胜利而来。只准打胜仗，不准失败；

第二，你们是为团结而来。如果打了胜仗而没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也不算完成任务；

第三，战场上缴获的一枪一弹，都要完好地留给刘邓部队。谁如果违反了，就别来见我！

司令员只用了几分钟时间的战斗动员简明而又有力。

张明立刻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好首长交给的任务！”声音也同样响亮。

孙司令员一眼就看出张明对即将投入的战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脸上带着笑意说：“好，你去吧！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呢！”

两天后的夜里，枪炮齐鸣，围攻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了。“洛阳营”的战士们果然不负孙司令员的期望，他们勇猛顽强，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一举歼灭了蒋介石军队中号称“威武团”的黄维兵团，带着全歼敌人的胜利喜悦凯旋而归。

黄维落网记

1948 年 12 月 15 日，对于黄维来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黄昏，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数日，既无援兵解困，又无粮草救济，处于完全绝望的国民党第 12 兵团——黄维兵团残部，在解放军排山倒海之势的总攻击下，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趁着月亮还没有出来，四周原野一片漆黑，无数国民党兵仓惶向双堆集西北方向逃窜，解放军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扑过去。此时的双堆集漫天烟火，枪声、炮声和捉俘虏的呐喊声，交织成一曲最雄壮最热烈的乐章，响彻大地。

这时，特务营教导员范天枢正带领两个排的兵力，一边搜索，一边快速行进在去往旅部的路上。

月亮出来了，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大地，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

“有情况！”突然，通讯员桑小六压低声音向教导员范天枢报告。

“停止前进！准备战斗！”随着一声令下，部队四下散开，进入战斗状态。

“举起手来！”战士贾更新猛然向前，大吼一声，“快站起来！我们已经发现你啦！”

大家随着吼声向前望去，只见前方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一团黑影紧贴犁沟爬着，仿佛要钻到地里去。停了一会儿，那个黑影动了一下，接着慢腾腾地爬起来，并举起双手。

近前一看，是个国民党军人。这个人头戴一只大钢盔，前沿拉得很低，几乎连眉毛都看不见，钢盔的阴影遮住了他的面部，看不清眉脸；身上穿一套细布棉军装，上衣左口袋上挂着一只指北针，右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他怯怯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高举着。

“啪！”桑小六一把将他的钢盔打落在地。他下意识地想抓住钢盔，左手一抬，露出手腕上一只硕大的手表，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掀牙钢盔，才露出了他的面目：一头光滑的头发，一张惨白的圆脸，留着短须，两只绝望而狡黠的眼睛，不安地瞟着围上来的解放军。

“你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范天枢问他，同时，示意贾更新把枪从他身边挪开。

“我是 85 军军部上尉司书方正馨。”他像背书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怎么过的河？为什么裤子没湿？”敌人溃逃的方向必须过一条河，他却没有湿了衣裤。贾更新见此情景故意问。

“骑马过的河。”他答道。

“马呢？”桑小六接着问。

“嗯……”他语塞着，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停了一会儿，又说：“是找人背着过的河”。

“很显然他在撒谎”。范天枢心想，弄不好今天逮住的是一条大鱼。于是，他厉声说：“看样子你不只是一名上尉军官，恐怕起码是个师长吧？”

听到这话，自称是“上尉司书”的人，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为了尽快赶到旅部，范天枢再没多问，带领部队继续前进，顺便把这个俘虏带到了旅部。

第二天，旅敌工科科长宋禹同志开始审问这位“上尉司书”。

宋禹先拿起放在桌上的俘虏登记簿，念着上面的记录：“方正馨，江西弋阳人，85 军军部上尉司书。”

“这上面写的是真实身份吗？”宋科长问他。

他点点头，没有吭声。

“什么时候当的兵？”

“今年8月。”

“当兵前干过什么？”

“民国十七年当小学教员。”

“还干过什么？”

“嗯……”他一时回答不出来，神色有些慌张。接着，赶紧说：“当过六年教员，一年科员就出来当兵了。”

宋科长忍不住笑了起来。民国十七年 （1928年）干了7年事才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现在是民国三十七年（1938年），这不是明摆着撒谎吗？

听见宋科长笑，他自知说漏了嘴，更加慌张起来。

“算算你的历史，那13年哪里去了？你这谎撒的也太不高明了！”宋科长嘲讽地问他。

他懊丧地低着头，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头，嘴里咕哝着：“我真糊涂！我真糊涂！”

“你是上尉司书吗？”宋科长继续问。

“是，是上尉司书。”

“那我问你，上尉司书一个月多少饷？”

“70多。”

“多多少？”

“这，这个……”他怔了一下，又装出满脸的可怜相，用两手又捶着自己的脑袋说；“这一仗真把我打糊涂了，打糊涂了！”

看到暂时问不出什么，宋禹就安排看管的哨兵注意他的动向。

这个自称“上尉司书”的方正馨，与其他几十个被俘军官关在一个大屋子里。晚上，一个名叫唐铁冰的国民党团长和方正馨并排睡在一起。唐铁冰曾命令部队施放毒气，枪杀解放军被俘人员，罪大恶极。半夜时分，其他人都睡着了，只有方正馨翻来复去睡不着，弄得身下铺的稻草作响。

“你怎么也被俘了？”忽然，里面传出微微的声响。哨兵马上判断是唐铁冰的声音。

“少多嘴！”恶狠狠的声音，这是方正馨制止的声音，以后，再没听到什么动静。

第二天早晨，宋科长首先提审唐铁冰。

“昨晚你们说什么？”宋科长问。

“没，什么也没说！”唐铁冰一口咬定昨夜说了话，同时也否认与身边睡着的人认识。

“不老实！”宋科长厉声说：“你是罪上加罪！如果坦白了可以立功赎罪。”

唐铁冰紧皱双眉犹豫起来，他心里清楚，自己身上的罪有多大。

“是不是你们的长官？”宋科长试探他。

“似，似乎有点像，好像又不像。”他吞吞吐吐地回答着。

“像谁？”宋科长紧逼一句。

“你们是不是说他像我们兵团司令官？”唐铁冰小心翼翼地说。

“到底是还是不是？”宋科长又紧追一句。

唐铁冰沉默不语，怎么也不肯说了。

看他有顾虑，宋科长就对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老实说了，可以将死罪减免，重罪减轻。”

双堆集歼灭战胜利结束，旅部就将这些被俘军官送到纵队集中。负责押送这批俘虏的宋禹科长刚到纵队不多一会儿，唐铁冰就要求面见宋科长。

“长官，我有重要情况禀告。”一见宋禹，唐铁冰就满脸堆笑地说。

唐铁冰刚要张嘴，又犹豫起来，而且不断地用眼瞟着坐在不远处的方正馨。

宋科长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故意装着不耐烦的样子说：“没有事我走了！”

一见宋科长要走，他有些急了，马上抬起头来说：“长官不是问睡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吗？”

“是呀，你想起来了！”

“是。我个人认为很像我们的兵团司令官，不过，个人所见恐不确切，贵军俘虏的高级将官很多，请再多多考察考察。”说完，他还问宋科长这算不算是立功？宋禹回答他可以考虑。

听说面前这位方正馨可能就是 12 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宋禹有些激动，立即将此情况向纵队敌工科燕科长作了汇报。

为了证实唐铁冰交代的情况，纵队燕科长立刻叫人把 12 兵团所辖 18 军副军长兼 11 师师长王元直带来，问他认识不认识黄维，他说当然认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说出黄维的形象来。照王元直描绘的样子，燕科长和宋科长马上断定，“方正馨”正是黄维。

于是，燕、宋两位科长叫人把方正馨带上来。

一进屋，方正馨就看到了坐在那里的王元直，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还没等问他什么，他就先开口了：“这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

正坐在那里的王元直，一听说话声，回头一看，两眼怔住了，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方正馨”。

“你到底是什么人？”燕科长厉声问道。

“……”方正馨不说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都说过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方正馨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

最后，他竟然耍起无赖，说：“你们要不信，我可以具结。”说完，他就在纸上写下：如姓名职务不符，愿受枪毙。并且口气十分“强硬”地说；“我还能胡说八道吗？难道我还能出卖自己的姓名吗？”

方正馨被带下去后，燕科长问王元直：“是不是黄维？”

“有点像，可能是他。”

为了稳妥起见，又找来在抗战时期给黄维当过马夫，现在是解放军饲养员的李永知，还找到一个黄维过去的汽车司机来辨认，结果是肯定的，方正馨就是黄维。

最后一次讯问开始了。

方正馨一口咬定就是“上尉司书”。

“你不要装糊涂了！52 团团长唐铁冰不认识你？ 11 师师长王元直不认识你？你的马夫、汽车司机不认识你？你不是所谓的上尉司书，你就是国民党 12 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燕科长厉声对他说。

他知道这下隐瞒不过去了，就战战兢兢地说：“我自己都具结过了，还

有什么好说的。”

燕科长一听他害怕照他的“具结”判他的罪，于是便当着他的面将那张“具结”撕得粉碎，冷笑一声对他说：“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你的什么保证，老实承认也总会对你自己有好处。”

他沉默了半响，抬起头来欲言又止，最后无可奈何地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就是谁吧！”

“啪！”燕科长猛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呵斥道：“你是谁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这时的“方正馨”，脸上开始青一阵、白一阵，又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就是黄维。”

假“方正馨”终于现出了原形。

爬也要爬进关去

1948 年 11 月 2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战略作战方针的指引下，以歼敌 47 万的伟大成果，结束了闻名中外的辽沈战役。

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东北全境及热河省的解放，白山黑水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欢庆胜利的锣鼓响彻松辽大地。英勇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在加紧休整，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此时，东北野战军 3 纵政委罗舜初，躺在刚刚解放的沈阳城中一幢小楼里，已整整昏迷了 10 整天。今天，终于摆脱了死神的纠缠，苏醒了过来。10 天前，正当罗舜初政委和韩先楚司令员指挥 3 纵将士克锦州、战辽西，痛击国民党“王牌”新 1 军、新 6 军，活捉敌酋廖耀湘的时候，他在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中身负重伤。当人们把罗政委从废墟中挖出时，他已七窍流血，不省人事了。

“罗政委苏醒了！”

消息很快传到部队，同志们纷纷赶来看望他。罗舜初从大家的口中得知：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党中央、毛主席认为，东北解放以后，只需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夺取全国的胜利。为了协同华北我军解放华北，进而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作出东北野战军提前进关的战略决策。罗舜初听了，深深为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而精神振奋，身上的病痛也仿佛减轻了几分。

但是，也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传到了罗舜初的耳朵。在胜利面前，一些同志思想上滋生了享乐主义情绪，认为东北解放了，该享受享受了，思想出现了滑坡；有的干部以年龄大、身体不好为由，提出到地方工作的要求。有些东北籍战士，认为家乡解放了，土地分到了手，想解甲归田，而不愿再过艰苦的战斗生活，更不想远离家乡入关打仗。更有那些补充了大批俘虏和新兵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思想动员就奉命入关，情绪波动更大，5 天之内就有 500 多人开了小差……

“这还了得！”罗舜初再也躺不住了。面对这种情况，他心急如焚：现在虽然取得了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但这只是局部的胜利；东北虽然解放了，但关内还有大片的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着。作为一个誓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共产党员，决不能中途歇脚，要继续为夺取全国胜利奋不顾身地去战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部队，教育官兵。于是，

他坚定地对前来看望他的纵队副司令员沙克同志说：“快回去告诉部队，我很快就回去。一定要入关，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

罗舜初政委的崇高思想品德和模范行动，极大地教育了干部，感染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参战热情很快又高涨起来。

11 月 19 日，在东北野战军召开的政工会上，罗荣桓政委在批评了少数干部继续革命的思想发生动摇的错误后，高度赞扬了罗舜初同志“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的革命信念，号召野战军“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 3 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罗舜初的模范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为夺取全国胜利再建奇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的演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于 1927 年 8 月 1 日，但当时这支军队并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是经过一个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直到 1948 年才正式确定的。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的暴发，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当时我军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义，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为贺龙。

1927 年 8 月，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提出了“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的任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地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部队大多称为“工农革命军”。毛泽东 1927 年 9 月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的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但此时我军的名称还未统一，除“工农革命军”外，还有其他的名称，如有的称“共产军”、“工农讨逆军”等。1927 年 11 月，党中央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我军的名称统一称为“工农革命军”。

从 1928 年 5 月开始，我军称为“红军”。“红军”的名称是党中央参照苏联的做法，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时将我军“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称。”1931 年以后，我军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简称。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向中国进攻。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御外侮，使中华民族免遭涂炭，党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党军事当局正式宣布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第 115 师（师长林彪）、第 120 师（师长贺龙）、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同年 9 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又宣布将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同年 10 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我军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 8 省 13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因此，在抗战时期，我军部队主要是北方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革命军”名声扫地，我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称便自动取消。1945 年 9 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将部队整编为野战军。各部队多以“野战军”

前加地区名相称谓，如“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等。而中央的一些文件和新华社的报导，则时而称我军为“解放军”、“人民解放军”。

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通令规定，我军团和军分区以上各部队名称，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从此，我军正式统一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周副主席的茶缸盖

一九四八年冬的一天，警卫员小成见周副主席外出回来，就赶忙提来水壶，要给周副主席倒缸热茶。本来茶缸子上的搪瓷早已脱落了三、四块，很是残旧。早该换了，可今天又发现茶缸盖也变得黑一块白一块，坑坑洼洼，歪歪扭扭，怎么也盖不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一打听才知道来由，原来在周副主席回来的路上，茶缸盖从汽车上掉了下来，被轧成这个样子。

小成想：茶缸是周副主席每日不可缺少的用具。如今盖不能用了，茶缸也破旧得不像样子，我上供给处换个新的来。

这件事情想着容易，真要办成就难了。因为周副主席一向俭朴，他的日用品，能将就用的，从来不让轻易换新的。他不仅日日夜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精力，而且时时刻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节约财物。工作人员几次要把这个茶缸换个新的，他都没允许。这次小成想：“先换后说”，趁周副主席聚精会神看文件时，就悄悄把茶缸拿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供给处去找科长老陈。

老陈正在清理账目，见小成来了，就问：“干什么？小鬼头。”

小成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也向你要一样东西。你若是不给，我和你到主席那里去说说。”

老陈说：“哟，这么复杂！”

小成从兜里掏出茶缸和茶缸盖，说：“你看，也复杂也不复杂。”

老陈一下子明白了：“是要茶缸的吧？”

小成“嗯”了一声。

老陈把橱子门一开：“你看！”

呀！早准备好了，一个白净净、光亮亮的新茶缸。小成心里一阵惊喜，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赶紧说：“快给我吧！”

老陈说：“等一等！”

只见老陈又把橱门关上，对小成说道：“刚才刘参谋来，说周副主席的茶缸盖轧坏了，趁机给他换个新缸子。我想，就这样去换，周副主席准不答应。我计划今天吃饭时，用新茶缸盛着汤端去，顺便把旧茶缸拿出来，这样……”

小成一下子笑起来，心里称赞老陈想的巧妙，忙说：“沾！”

开饭时，小成照计用新茶缸给周副主席端了汤来，饭后又用新茶缸倒上茶水。他轻轻地走出屋来，想不声不响地就这样办成。哪知周副主席伸手一端茶缸，发现换了新的，就喊：“小成！”

小成在屋外迟疑了一下，只好回答：“有！”进了屋，故意问：“干什么？”

周副主席微笑地看着他，待了足有十来秒钟，才说：“你又跟我耍什么

花招？旧茶缸呢？”

小成恳求似地说：“送到供给处去了，我看实在不能用了。”

周副主席说：“旧点怕什么？只要不漏水就没关系。”

小成说：“盖也坏了，您还要经常热饭……”

周副主席说：“盖儿，我早准备好了”。周副主席说着站起身来，从箱子式的书架上拿出一个粗瓷小碟子。

周副主席把小碟子盖上，说：“这不正合适吧？”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人民的解放事业需要我们这样做呀！”

还有什么说的，小成只得拿回旧茶缸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副主席还使用着那个旧茶缸和那很别致的茶缸盖——粗瓷小碟子。

风雪夜里的灯光

1948 年的冬天，位于太行山里的平山县西柏坡异常的寒冷。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夜已经很深了，任弼时同志的窑洞里还亮着灯光。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无情地拍打着窗户，发出阵阵令人生畏的“沙沙”声。

“！！！”墙上的挂钟敲打了三下，清脆的钟声把警卫员小邵从温暖的梦乡里惊醒，他借着里屋透出来的灯光一看，已经是深夜 3 点钟了。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里屋传来，小邵心里一惊：“首长的病又发作了。”

任弼时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整年累月地为革命紧张工作，积劳成疾。特别是早年在敌人的监狱里，非人的折磨过早地夺去了他的健康，使他人到中年便疾病缠身了。但他总是带病坚持工作，近几个月来，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辽沈战役刚刚胜利，淮海战役激战正酣，平津战役硝烟又起。频繁的战报，雪片似的电文都需急复。任弼时同志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在一起共议战事，运筹帷幄。过度的劳累使他的心脏病、高血压及肺病又严重的发作了。

小邵急忙穿衣下床，一看首长的大衣不知什么时候又盖在了自己的被子上。顿时感激与内疚之情同时袭上心头：“首长身体不好，还惦记着怕我冷，我作为首长的警卫员，应该照顾好首长，反而……”他夹着军大衣轻轻地往首长的里屋走去。到了门前，小邵隔着玻璃朝里一望，只见桌子上摆满了文件和电文，任弼时同志伏在桌子上，夹笔的右手捂着前额，左手按压在胸口上，随着断断续续的咳嗽声，身子在微微地颤抖着。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面容，但充满血丝的双眼还在一刻不停地看着文件。看到这一切，小邵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真想立刻进屋去劝首长到床上好好地休息，可是以往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劝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反而还影响了首长的工作。又着急又无奈的小邵急忙跑去把米大夫找来。和米大夫商量了一个办法，才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任弼时同志的屋里。

“半夜三更，你们起来干什么？”任弼时同志边问边递笤帚叫他俩扫扫身上的雪。

小邵把大衣给首长披上，米大夫端来一杯开水，两人恳求地说：“首长，3 点多了，该休息了。”

任弼时同志习惯地说：“我还有两页，看完了就睡，你们先去休息吧。”

小邵向米大夫使了一个眼色，米大夫不慌不忙地说：“首先，近几天您

的血压一直很高，我再给您测一次，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任弼时同志脱掉一只袖子，说：“这倒可以，测完了你们快去休息吧。我还要看两份文件。”

米大夫测完血压后严肃地说：“高压达到了 222，必须立刻治疗和卧床休息，否则会有危险的，我先给首长打一针镇静剂，再吃些降压药；小邵，你收拾一下床铺，添添炭火，让首长休息。”

任弼时同志微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吧？我的病我知道，我现在并不十分难受。”

米大夫着急地说：“首长，您的病很严重了，我做为医生，有责任、也有权力让您休息，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希望首长能体谅我的心情，否则，我只有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了。”

任弼时同志看到米大夫和小邵着急的样子，心里也很受感动，他深情地说：“米大夫，你和小邵的心情我很理解，可眼下前线打得正紧，指挥员们一边指挥作战，一边眼巴巴地等着中央的指示，你们想，在这关系国家命运和人民前途的关键时刻，我能躺得住，睡得着吗？再说，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现在不是也没有休息吗？”缓了一下，任弼时同志又轻轻地对他俩说：“好了，你们快去休息吧，我会注意身体的。”

首长的一片肺腑之言，说得米大夫和小邵心里热热的，酸酸的，他俩强忍着泪水，默默地给首长的杯子里续上了热水，炉子里添好了炭火，把药片放在桌子上，轻轻地退出屋来，站在风雪中任凭泪水自心中流淌出来。透过朦胧的泪光，他们看到毛主席住的屋里亮着灯光，周副主席的屋里亮着灯光，年迈的朱总司令窗前也是灯火通明。他俩突然间似乎彻底明白了：是这西柏坡中央政治局大院里彻夜不熄的灯光，照亮了祖国的神州大地，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给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

毛主席的衬裤

毛主席的勤务员小韩兴致勃勃地换上刚领来的新军装前看看，后看看，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合身！

换好军装，她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为毛主席缝补一条白底兰条的衬裤。这条衬裤至少也穿了四、五年，单面绒已经磨得没有了，变成了平纹布，膝盖、裤脚都打了补丁，而且不止一块，有的粗针大线，有的细针密线，看来经过几个人的手补了，毛主席真是……

小韩缝着，想着，一针扎下去，由于用力稍大，线又把衬裤带了个窟窿，看来，真不能再穿了。对！今天刚好发军装，趁机给毛主席换一条……

小韩来到行政处，管发服装的老王正捆一把旧笤帚，用秃了的笤帚蔑子到处都是。她把衬裤一下子搭在笤帚上说：老王，换条衬裤！

老王抬起头，拿过去一看，说：还不能换！

小韩一听可急了：怎么？你卡住啦？前方打胜仗，后方发展生产，经济条件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工作人员还穿新军装呢，让毛主席穿这样的衣服？

老王慌忙放下笤帚解释说：小韩呀，你是新同志，还不十分了解情况，为换这条衬裤我已跟主席说过多少遍了，他总是说，不要紧，还能穿嘛！主席还说，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要随便给他添东西。你看这把笤帚，都散了，主席还让把这两把并一把，捆捆再用。我比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年头多，

更了解毛主席的心意呀！

看来，换衬裤的关键还在主席那儿，想个什么主意，让主席换一件呢？小韩可动开了脑筋。哎，对！小韩忽然想到：毛主席向来爱听群众意见，我亲自找他老人家提个意见，再说，这条衬裤也确实该换了，实事求是嘛！

小韩连蹦带跳地来到毛主席办公室门口，“报告”二字到了舌头尖又咽了回去。他看见毛主席正在忙着，桌上放着那么一大堆文件，就不想再打扰主席了。她转身刚要走，毛主席已经看见了。主席亲切地问：小韩呀！有事吧？

小韩回头说：有一件事，不大也不小。您先办公吧，有空时，我再来找您说。

毛主席从桌边站起来说：进来吧！这也是办公嘛！

小韩走进办公室，主席拉过一把椅子，让她坐在对面。小韩拿着那条衬裤说：主席，我给您提个意见。您看看，这条衬裤早就该换了，您不让换，大家都有意见了！

毛主席哈哈地笑了，说：噢，这个意见呀！好，我看看还能穿不。毛主席接过衬裤看了看，抱歉地说：还是请你费心再补一次吧！能多穿一天就多穿一天，前方每天都在打仗，战士们比我更需要衣服，新衣服应该留给他们穿。毛主席微笑着又把衬裤递给了小韩。

小韩双手捧着衬裤，沉思片刻，扭头就往回跑，忘了给主席敬礼。刚跑了两步，主席又喊住她：小韩，告诉老王，今年我的军装一件也不要换！

“是！”小韩停下脚来，回头看看，毛主席还在微笑地看着她。

回到宿舍，小韩又重新坐在门口小板凳上，一针一针地为主席缝补衬裤。她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了，懂了不少事——在这里刚刚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报告，号召全党、全军“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时，他老人家身上穿的，不正是不久前刚刚补过的军装上衣吗？……小韩缝得是那样的细心认真，把自己对“艰苦奋斗”含义的理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都倾注在这密密的一针一线上。

就这样，这条衬裤由小韩补补缝缝，缝缝补补，到北京时，已经和夹裤差不多了，可是，毛主席还在穿着它。

到北京以后，据说这条衬裤毛主席又穿了两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把这条衬裤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下来，以后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